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 53 期

学科信息参考

A 辑

（经贸、金融、会计、管理、信息）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

学科信息参考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 53 期

目 录



主办：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
主编：
王 群 谢丹迎
责任编辑：孔凡娟
编辑：
经贸：李雁
金融：唐永辉
工商管理、商务信息：李谋信
制作：艾致
出版日期：
2012 年 3 月 30 日

国 际 贸 易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出口贸易扩张——基于我国 28 个工业
大类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1

产 业 经 济

产业升级的内涵与模式研究——以广东产业升级为例..... 7

物 流 管 理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模型及案例分析.....13

技 术 经 济 与 管 理

加强技术经济管理提高电网投资效益.....19

会 计 学

高等院校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探讨.....21

金 融 学

风险管理与金融危机: 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的思考.....23

企 业 管 理

再制造中质量信息割裂的博弈分析.....28

统 计 学

对外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33

美国服务贸易的环境效应——以出口为例.....36

快 讯

2 月单月贸易逆差达罕见的 314.9 亿美元.....43

利用本土市场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45
温州金融改革再出发——对温州金融风波的认识及推进改革思路.....	46
房价调控将如何收场?	49
金融货币长周期将在哪里出现拐点.....	51
监管高层: 贷存比不宜也不能废止.....	54
周小川: 理论上调整存准率的空间非常大.....	54
日本转投货币宽松阵营.....	55
阿里巴巴22位中高层大轮岗.....	57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出口贸易扩张

——基于我国 28 个工业大类 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1 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环境公害以及环境突发事件在我国屡见不鲜,经济学人所期盼的与收入提高相伴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正效应尚未整体显现,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的背后显然隐匿着无以复加的环境代价,从而,加强环境规制、促进环境技术进步的社会期望也日趋强烈。宽泛地说,环境规制是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为了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协调发展,对个体或组织所采取的一系列约束规则或特定行为,具体而言存在多重维度,有市场与非市场、强制与非强制、显性与隐性之分,不过,基于经济学思维逻辑的环境规制一般属于市场性、强制性和显性的。尽管20世纪7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与绿党政治潮流以来,不少研究试图阐释与检验环境规制以及环境技术进步对贸易的影响与作用,但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存在明显的分歧。梳理国内外主流研究文献,不难发现两条截然不同但颇具借鉴意义的研究线索。

第一,环境规制促使外部化的环境成本内在化,进而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最终不利于提升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抑制了出口贸易的扩张。国外学者 Pething (1976)、Siebert (1977)、McGuier (1982)、Palmer (1995) 等较早对环境规制效应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尽管结论存在差异,但基本支持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强化环境规制会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观点; Van Beers 等 (1997)、Kalt (1998) 则认为严厉的环境政策在特定条件下将对出口产生显著负效应; Mulatu, Abay 等 (2004) 发现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阻碍污染密集型企业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近几年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上述论点,譬如,杨涛 (2004) 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减少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王勇 (2007) 则从理论上解读了国外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消极作用; 梁冬寒等 (2009) 发现环境规制轻微抑制了我国重污染制造业的出口扩张; 周力、朱莉莉、应瑞瑶 (2010) 的研究证实环境规制会明显抑制我国成本加成型产品的出口。第二,环境规制激励企业积极开展环境技术创新,进而出现技术进步收益超越生产成本的上升,最终有助于提升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扩张。在国际学术界,一些研究显然赞同这一论点,譬如 Paul Parker (1990) 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促进了新技术的发展、培训与维护,进而创造新的贸易机会; Porter and Linde (1995) 发现严格的环境管制客观上会激励企业创新,进而提高出口竞争优势; Slater & Angel (2000) 认为环境压力激发的技术创新可以使产业获取一系列竞争优势; Pickman (2003) 基于美国制造业的分析显示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同样,支持这一论点的国内研究也日渐增多,黄德春、刘志彪 (2006) 和赵红 (2008) 的研究显示,环境规制虽然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但更会激励企业提升技术进步水平; 赵玉焕 (2009) 的研究证实,就长期而言,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有助于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增长乃至扩张; 赵红、扈晓影 (2010) 认为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最终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推动作用。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不支持上述两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严厉与否与对外贸易之间未必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逻辑,环境规制的出口贸易效应取决于各种具体的约束条件,从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见,环境规制、环境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出口贸易是一个颇具争议且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论题。有感于此,笔者拟采用 1992-2008 年我国 28 个工业大类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一个非限制向量自回归

模型, 并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以期从长期均衡角度考察出口贸易扩张、环境规制、环境技术进步之间的动态变化规律, 从短期波动角度分析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进步水平对出口贸易扩张的影响和作用。

2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实证研究涉及出口贸易规模、环境规制、环境技术进步三个时间序列变量, 分别记为EXP、ERL、ETP, 其中EXP为被解释变量, ERL、ETP为解释变量。为了保证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性, 各变量指标仅仅针对采矿业和制造业两大主要工业门类中的28个工业大类, 不涉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门类, 剔除了“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8种较难获取数据或数据匹配性很弱的制造业大类。

同时, 鉴于直接衡量我国环境规制、环境技术进步的统计指标十分缺乏, 故所选28个工业大类出口贸易总额表征出口贸易规模EXP; 以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即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之比, 表征环境规制水平ERL; 以工业污染强度的倒数即工业GDP 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之比, 表示环境技术进步水平ETP。其中污染物排放量为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废水污染物排放量与固体废物污染物产生量之和, 废气污染物是指废气含有的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工业烟尘, 废水污染物是指所排放废水中含有的汞、镉、六价铬、铅、砷、氰化物、挥发酚、化学需氧量、石油类、氨氮; 出口贸易额、GDP 指标单位为百万元人民币, 各类污染物排放量(产生量)、去除量等指标单位为吨。另外, 需要说明的是, 研究样本仅限于1992-2008年国有及国有规模以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 各工业大类产值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污染排放物数据源于《中国环境年鉴》, 出口贸易数据源于历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在实证建模时,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剧烈波动与异方差的影响, 分别对三个变量取对数得到LNEXP、LNERL、LNETP, 分别表示我国工业出口贸易扩张水平变动率、环境规制水平变动率、环境技术进步水平变动率。

3 实证分析

3.1 VAR 模型构建与检验

希姆斯(C.A.Smis, 1980)开创性地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引入经济学研究, 这种非结构化模型旨在把经济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视作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 从而揭示变量间的动态变化规律, 与建立在经济理论基础上的结构化模型相比, VAR模型更有助于研究随机扰动对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动态影响。鉴于此, 笔者首先构建一个VAR模型, 再基于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从而对我国工业出口贸易与环境规制、环境技术进步间的动态关系予以考察。

(1) 变量平稳性检验

一般而言, VAR 模型中的每一个变量都必须具有平稳性, 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 则必须存在协整关系。因此, 在构建VAR 模型之前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所谓平稳的时间序列是指具有稳定的趋势、波动性和横向联系, 即均值、方差为不变的常数, 两个时期间的协方差仅与两期之间的时期间隔有关。检查序列平稳性通常采用单位根检验, 笔者选择较具普适性的ADF 检验对LNEXP、LNERL、LNETP平稳性予以考察,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 可见, 变量LNEXP和LNET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变量LNERL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而3个变量都为零阶单整，即I（0），属于平稳序列。

表 1 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序 列 变 量	检验类型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结论
	截距	时 间 趋 势	滞 后 阶 数	t 统计	概率（P 值）	1%	5%	10%	
LNEXP	有	有	3	-5.871	0.0024	-4.886	-3.829	-3.363	平稳**
LNERL	有	有	0	-4.130	0.0254	-4.668	-3.733	-3.310	平稳*
LNETP	无	无	0	-3.188	0.0035	-2.718	-1.964	-1.606	平稳**

注：滞后期以SC 值最小准则来确定，“*”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平稳，“**”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严格地说，尽管一些经济变量从模型构建上会呈现显著相关性，但其相关未必具有经济学意义。因此，在建立模型之前有必要进行 Granger 因果检验，否则可能会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Granger 检验对滞后长度要求十分敏感，人们一般采用信息准则（AIC、SC、HQC）来判定，或者通过“从一般到特殊”（Davidson、Mackinnon，1993）的方法来设定。为了更有利于获得有效结论，笔者基于第二种方法对各变量进行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长度（q=s）	Granger 因果性	F 值	F 的 P 值	结论
2	LNERL 不是 LNEXP 的格兰杰原因	6.41327	0.0161	拒绝
2	LNEXP 不是 LNERL 的格兰杰原因	0.6945	0.2432	接受
2	LNETP 不是 LNEXP 的格兰杰原因	5.89989	0.0203	拒绝
2	LNEXP 不是 LNETP 的格兰杰原因	0.09574	0.9095	接受

从表 2 可以发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LNERL 是 LNEXP 的格兰杰原因，而 LNEXP 不是 LNERL 的格兰杰原因；LNETP 是 LNEXP 的格兰杰原因，而 LNEXP 不是 LNETP 的格兰杰原因。从而，解释变量 LNERL、LNETP 与被解释变量 LNEXP 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3） VAR 模型最优滞后期确定

为了保证VAR模型参数具有较强解释力，必须在滞后期与自由度之间寻求均衡。笔者应用 Eviews6.0 软件，基于LR（似然比）检验统计量、FPE（最终预测误差）、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

表 3 VAR 模型滞后期选择准则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120.2489	NA	2752.177	16.43318	16.57479	16.43168
1	-78.39863	61.38037*	35.84308*	12.05315*	12.61959*	12.04712*
2	-70.31654	8.620898	49.24018	12.17554	13.16681	12.16498

注：“*”表示根据各评价指标分别选择的最优滞后期。
性之后，最终将最优滞后期定为1。

则与HQ信息准则五个常用指标对滞后长度进行选择，结果如表3所示。

不难发现，表3显示五种准则都倾向于建立1阶滞后模型，所以在综合考察模型拟合度（R²=0.996981）、残差的自相关性、异方差性和正态

（4）VAR 模型的构建、估计及其稳定性检验

基于上述变量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最优滞后期选择，结合VAR模型的基本思想，建立如下VAR 模型：

$$y_t = \sum_{i=1}^k a_i y_{t-k} + \mu_t$$

(1)

（1）式中， y 代表时间序列变量， k 为滞后阶数， $t=1,2,3$ 为样本个数， a_i 为 $k \times k$ 维系数矩阵， μ_t 是 k 维扰动列向量。

根据Eviews6.0对VAR模型参数估计值，得到以下3个方程式：

$$LNEXP = 0.343LNEXP(-1) + 0.010LMERL(-1) + 0.872LNETP(-1) + 142.176$$

(2)

$$LNEXP = 0.064LNEXP(-1) + 0.0451LMERL(-1) + 0.367LNETP(-1) - 5.956$$

(3)

$$LNEXP = 0.127LNEXP(-1) + 0.246LMERL(-1) + 0.587LNETP(-1) - 30.061$$

(4)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有意义的VAR 模型必须是稳定的，因此对模型稳定性进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见，该VAR 模型特征方程所有根的倒数的模小于1，即全部根的倒数值均位于单位圆内，因此，VAR 模型是稳定的，这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提供了基础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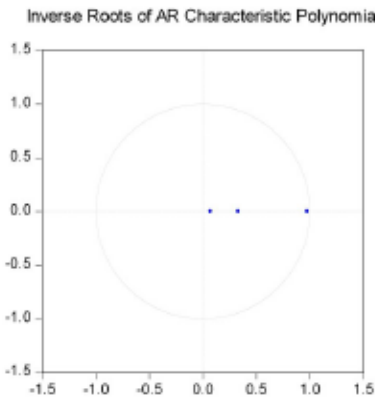


图 1 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结果（Graph形式）

3.2 协整检验分析

协整检验既可以决定一组非稳定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也可以用来判断线性回归方程的设定是否合理（高铁梅，2006）。因而选择Johansen 检验对VAR 模型进行协整分析以避免伪回归。一般而言，对非限制性VAR 模型进行协整检验的滞后期应是其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本文VAR 模型最优滞后期是1，则协整检验滞后期为 0。采用EViews6.0 基于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和特征根迹统计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Johansen 检验结果

协 整 个 数 原假设	特征值	最大特征根检验			特征根迹检验		
		最大特征根统计量	5%显著水平	PP 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水平	P 值
0 *	0.803646	26.04542	21.13162	0.0094	34.95212	29.79707	0.0117
至多 1 个	0.418603	8.677133	14.26460	0.3140	8.906708	15.49471	0.3741
至多 2 个	0.014246	0.229575	3.841466	0.6318	0.229575	3.841466	0.6318

注：带有“*”标记的表示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 值依据MacKinnon-Haug-Michelis （1999）提出的临界值所得。

Johansen 检验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 0 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而接受了至多存在 1 个协整方程的假设，这表明 LNEXP、LNERL、LNETP 三个变量在 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标准化协整方程系数如表 5 所示。

表 5 标准化协整方程系数表

LNEXP	LNERL	LNETP
1	0.292888 （0.11431）	-1.612859 （0.09188）

由表 5 可以得到协整方程：

$$LNEXP = -0.29289LNERL_t + 1.61286LNETP_t + ecm_t \text{ ④}$$

(5)

由（5）式可以看出，在长期，环境规制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出口贸易规模就会缩减0.29289个百分点；环境技术进步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出口贸易规模就会扩张1.61286个百分点。

3.3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旨在用来研究一个变量受到某种冲击时其对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因此基于VAR模型分别给变量LNERL、LNETP 施加一个正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可以得到LNEXP 的脉冲响应路径，如图2 和图3 所示。图2 显示当本期环境规制水平受外部条件冲击后，出口贸易规模在第1 期没有反映，第2 期则明显下降0.097051%，但在短暂的负向影响过后，第2到第3期又呈现较大速率的正向影响，以后各期提升速度逐渐下降，第7期影响最大，达到0.709319%，此后各期呈现小幅下降的趋势。图3 显示当本期环境技术进步水平受外部条件冲击后，出口贸易规模在第1 期没有反映，第2期明显提升1.542489%，达到最高，以后各期小幅波动并逐期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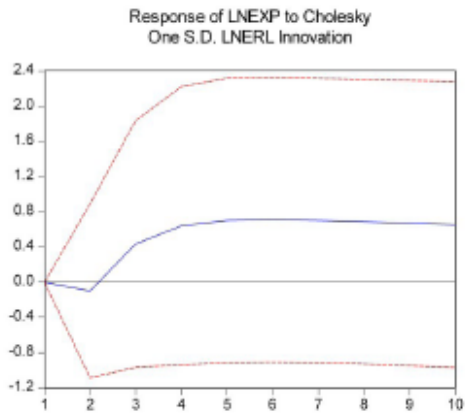


图2 LNEXP对LNERL的脉冲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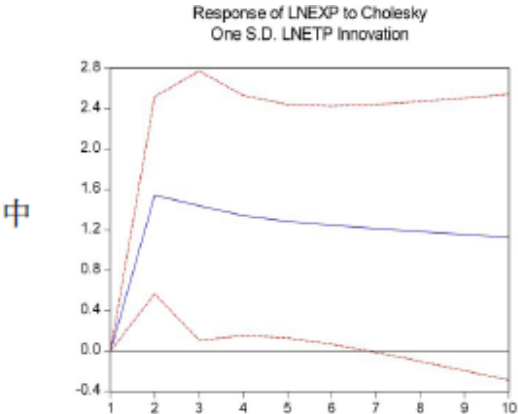


图3 LNEXP对LNETP的脉冲响应

注：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年），纵轴表示LNEXP；实线表示标准差新息的脉冲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如果进一步就我国工业品出口贸易扩张水平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技术进步的脉冲响应路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方面，无论环境规制还是环境技术进步水平，都会将其自身受到的冲击传递至工业品出口贸易规模，并产生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工业品出口贸易规模对环境技术进步水平的脉冲响应更为敏感。

（2）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旨在通过分析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来评价不同内生变量冲击的重要性。基于 VAR 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 6）显示，我国工业出口贸易扩张水平除了来自自身冲击的影响外，环境规制水平变动的贡献率在第 2 期为 0.1%，即我国工业品出口贸易扩张水平预测方差的 0.1%可以由环境规制水平变动来解释，之后几期都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而环境技术进步水平变动的贡献率在第 2 期就达 25.3%，即我国工业品出口贸易扩张水平预测方差的 25.3%可以由环境技术进步水平变动来解释，并且第 2 期后各期贡献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第 7 期后增幅开始放缓。比较而言，环境技术进步水平变动的贡献率远远超越环境规制水平变动的贡献率，即前者对我国工业品出口贸易扩张水平的影响远大于后者。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从长期看，我国工业出口贸易扩张与环境规制、环境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自1992年以来，环境规制促进了环境成本内部化，进而轻微抑制了出口贸易扩张，而环境技术进步显著促进了出口贸易规模扩张。但环境技术进步对出口贸易扩张的正效应远远超过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扩张的负效应，因此不必过于担忧环境规制会削弱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实行合理的环境规制仍然十分必要，甚或必须坚持不懈。

（2）从动态影响而言，无论环境规制还是环境技术进步，都会将其自身所受外部条件的冲击传递至出口贸易，并产生积极的扩张效应；但是，出口贸易扩张对环境技术进步的脉冲响应较之环境规制更为敏感。

（3）环境技术进步水平变动的贡献率远远大于环境规制水平变动的贡献率，即环境技术进步水平对出口贸易扩张水平的影响较之环境规制水平更为显著，因此，环境技术进步是影响出口贸易扩张的最主要因素。

4.2 政策建议

（1）切实健全、完善与贸易有关的环境规制政策。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环境规制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治理措施，当务之急，环境管理必须切实健全、完善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环境规制政策与制度安排，从战略高度优化治理机制，认真研究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中与贸易有关的环境规则，重点提升工业环境治理水平，提高出口商品的环境竞争力，减少与环境相关的对外贸易摩擦。

（2）提升环境技术进步水平，打造对外贸易的环境竞争优势。人类社会发展逐渐步入生态文明，一国环境技术水平的高低无疑会影响其出口商品的环境竞争力。因此，我国环境管理部门应结合国情国力，积极推进环境技术进步与创新，潜心研发、创新自主性工业环保技术，渐进提高工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大力降低污染密集型出口比例，藉此促进出口贸易环境要素比较优势向环境资本竞争优势转变，尽快降低我国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

（3）秉持科学发展理念，持续实施环境友好型出口战略。科学发展必将是21世纪社会经济成长的脉搏，我国出口企业应恪守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治理规则，秉持环保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清洁生产等科学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出口商品的环境竞争力和绿色附加值，实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发展，力求向国际市场提供质量优良、价格合理、清洁环保的产品，从而积极突破国际环境壁垒，努力贯彻环境友好型出口战略，逐步消除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过度依赖环境要素粗放投入的瓶颈。

表6 LNEXP 变量方差分解

预测期	标准误差 (S.E.)	LNEXP	LNERL	LNETP
1	1.676368	100.0000	0.00000	0.000000
2	3.066799	74.60258	0.100145	25.29728
3	3.816315	68.06220	1.367161	30.57064
4	4.372184	64.09778	3.196148	32.70607
5	4.832577	61.43536	4.721192	33.84345
6	5.230856	59.57072	5.868430	34.56084
7	5.583092	58.21259	6.725991	35.06142
8	5.898861	57.18719	7.379746	35.43307
9	6.184612	56.38875	7.890635	35.72062
10	6.445022	55.75088	8.299329	35.94979

注：第1列为预测期，第2列为变量LNEXP各期预测的标准误差。其他各列表示以LNEXP、LNERL、LNETP为因变量的方程新息各期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

作者：李怀政
来源：《国际贸易问题》2011 年第 12 期

产业升级的内涵与模式研究

——以广东产业升级为例



1 引言

随着东亚各国以产业升级战略成功带动国民经济迅速崛起,产业升级成为了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但学界至今还没有在产业升级内涵方面达成明确共识,部分学者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学者认为产业升级是主导产业的转换过程。上述观点实质上是雁行模式和主导产业替代理论的伸延与发展,理论本质依旧是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而波特则强调技术进步在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国家的资本、技术禀赋优于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禀赋时,要素比较优势推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过程。

以往研究往往把重点放在产业升级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而本文将通过理论分析给出产业升级的内涵,以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总结出产业升级的主要表现形式,并把不同的产业升级模式放入广东经济与产业发展历程中进行检验,从而归纳出广东产业升级的三种模式。

2 产业升级的内涵

2.1 基于要素禀赋动态转化的产业升级模型

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的演变趋势,它主要包括两种形态的资源配置趋势。本节将基于这种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动态转化理论,建立一个传统理念上的产业升级理论模型。

产业是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加总,我们在企业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给出一个产业的生产函数: $Y = f(A, K, L)$ 。其中 Y 为产业总产出, A 为技术水平, K 为实物资本投入,其中包括中间投入(原材料)、土地、水电能源等, L 为人力资本投入,其中包括低技术劳动力 L_L 和高技术劳动力 L_H 。土地、水电能源、 L_L 等与自然资源属性接近,属于“低端生产要素”;相应地, A 、 L_H 等人类加工和社会痕迹较强的资源属于“高端生产要素”。另外,中间投入(原材料)的技术含量和要素构成会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处于高、低端要素之间。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产业要最大化收益,就必须依据生产函数中各种要素之间的价格和边际替代率选择不同要素的投入量。

传统的要素禀赋动态转化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动态的要素禀赋转化将直接导致要素价格的变化,从而导致这个国家的生产比较优势不断转化。在不发达阶段,土地、水、 L_L 等“自然”要素相对丰盛且价格低廉;随着工厂林立、资源匮乏的发达阶段到来,低端要素逐步稀缺并且价格升高, A 、 L_H 等高端要素变得丰盛且价格相对价廉。在减少成本和最大化利润的动力下,每个产业都会不断调整投入要素的比例结构,尽量使用这一阶段国内丰盛而价廉的要素资源进行生产。这将导致企业的技术、组织形式、产品结构同步发展,进而推动产业内部的技术、组织、产品升级。某些产业一旦跟不上要素禀赋变动将步入衰退并最终被淘汰,转而进入后发国家去寻找丰盛的低端生产要素。同时,新兴主导产业将挤占衰退产业所仅剩的资源 and 市场空间,最终使产业结构出现转型性调整,各行各业同时也实现了产业升级。

2.2 完整的产业升级内涵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发展,企业要生产扩张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投入要素。由于特定时期的要素比较优势(如价格低、供给量大),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对这种要素资源产生巨大需求。但资源是稀缺而有限的,企业必须与同行竞争有限资源,产业也得与其它产业进行资源竞争。这样一来,要素市场中供给曲线的右移速度赶不上需求曲线的右移速度,要素价格逐渐上升至 p_2 ,其市场机制演化如图 1 所示。到了资源供给极限时,要素市场的供给曲线将不再右移,而只能增加斜率,使要素价格进一步上涨至 p_3 ,如图 2 所示。图 2 所示的这种“资源壁垒”将严重制约企业生产和产业发展。

这时,由于原来的主要投入要素逐渐紧缺,企业不得不升级技术、组织形式、产品结构来改变原有的投入要素结构,以便适应国家的要素禀赋转化。在周而复始的动态要素禀赋转化中,要素稀缺、成本高的衰退产业不断被淘汰,新兴主导产业不断出现。产业升级就在图 1、2 所示的要素市场机制演化下自发形成。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产业升级的内涵是:社会生产的低端投入要素价格在产业发展的需求刺激下日趋上涨,资源比较优势随之从土地、劳动力等低端要素发展到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这种要素禀赋的动态转化促使新兴主导产业不断涌现,并迫使旧主导产业只有通过技术、组织形式、产品升级才能减缓产业衰退,这个周而复始、由低至高的产业素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提升的动态过程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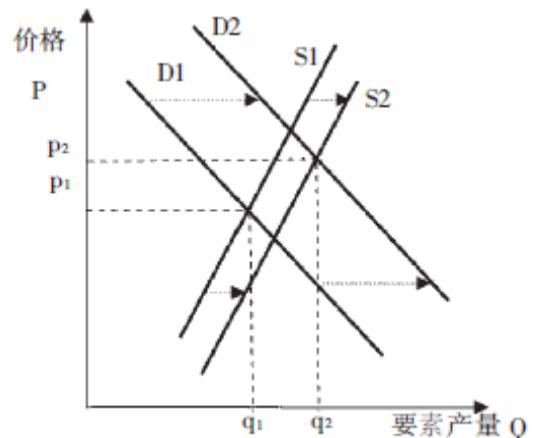


图 1 产业的上游要素市场发展示意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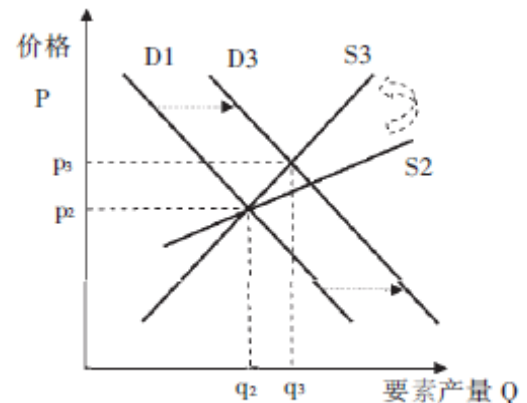


图 2 产业的上游要素市场发展示意图 2

3 广东产业升级的主要模式

产业升级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阶段、时期有着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本文将以先行先试的广东省为例,在多个维度下归纳出三种产业升级模式。

3.1 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 1

改革开放前,1978 年广东省工业总产值只有 206.56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也只有 43.92 亿元。这时广东的 L_H 等高端要素资源及资本极为紧缺,比较优势要素资源只有低技术劳动力 L_L 。在这样的要素资源禀赋下,改革开放这次制度变迁使广东主导产业开始向具比较优势的要素倾斜发展。在土地、水等资源相对丰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积极性和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第一产业增加值从 1978 年的 55.3 亿元急速上升到 1982 年的 118.2 亿元,GDP 比重从 29.8% 上升到 34.8%。在城市,以个体户组织形式为主的第三产业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GDP 比重从 1978 年的 23.6% 上涨至 1986 年的 33.4%。农业和个体服务业挤占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土地、水电能源、劳动力 L_L 等要素,使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1978—1986 年,第二产业比重从 46.6% 下降到 38.3%。作为当今我国的重要制造业基地,广东的第二产业比重却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断下降。

经过农业、个体服务业的资本积累,广东省居民存款开始丰裕起来,社会资本和投资资金开始活

跃起来。1978—1986 年的全社会投资总额、基本建设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分别增长了695.1%、479.7%和368.6%，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增幅高达1149.0%。随着货币资本逐渐充足，工业生产技术、原材料供应能力、水电能源等要素资源也得到长足的进步。这时，广东的要素资源禀赋开始向工业生产转移，工业发展所需低、高端要素资源开始丰富起来，农村劳动力也开始转移至城市从事更高附加值的工业生产。工业、制造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1987 年第二产业比重开始扭转负增长的局面，稳步回升。而农业比重自1983年开始逐步下降，一直下降到2008 年的5.5%。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在1985 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广东三次产业结构最终锁定在“二、三、一”型（2008 年为5.5：51.6：42.9）。

回顾这种模式下的广东产业升级历程，主导产业从改革开放初的“广东水珠江粮”自发过渡到工业，三次产业结构正式从“二、一、三”升级至“二、三、一”。这完全符合本文提出的产业升级内涵——要素资源禀赋的动态转化通过市场机制促使主导产业不断更替。

广东的产业升级模式还可以归纳为从轻工业起步，经过重工业化再到技术知识集约化的工业化过程。广东霍夫曼系数从1978年的1.3 开始逐步上扬，并在1990年达到峰值1.93。此后，随着技术、资本等要素资源禀赋转化，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要素资源丰盛起来，霍夫曼系数在1991年开始不断下跌，到了2008年霍夫曼系数仅为0.62，重化工业显然已成为广东省的主导产业。

两种不同路径的产业升级实质上均是主导产业更替和产业结构调整，本文把这两种产业升级的表现形式归纳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产业升级模式”——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要素禀赋转化，主导产业依次更替所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高度化可以是三次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主导产业更替过程；也可以是从轻工业起步，经过重化工业再到技术知识集约化的主导产业更替过程。这种产业结构逐步高度化的产业升级模式，我们抽象表达为图 3。

3.2 加工程度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 2

产业升级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动，也包括产品升级，即特定行业内企业沿某产品系列的攀升，从低质量低附加值产品转向生产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而波特也提出技术进步也是一种重要的要素比较优势。而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加工程度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则与广东省佛山市陶瓷业的产业升级历程极为吻合。

佛山的陶瓷生产历史悠久，自古便被誉为“南国陶都”。改革开放前，佛山陶瓷产业主要以日用陶瓷、工艺美术陶瓷为主，只有少量的建筑陶瓷。改革开放后，新的设备引进政策使佛山国有企业得以购买国外的生产线和新技术，从而推动了佛山陶瓷产业的要素禀赋转化，使技术成为陶瓷产业具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国有陶瓷企业首先开始积极引进国外的建筑陶瓷生产线，从事工艺流程更复杂、生产技术要求更高、附加值更高的建筑陶瓷生产。技术、加工度以及附加值的升级使产品结构发生剧变，建筑陶瓷就成为陶瓷产业的主导产品。改革开放使佛山陶瓷产业开始了从低加工度、低附加值到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递进产业升级历程。

在依托产品结构转化实现初次产业升级后，私营企业开始进入产业。激烈的竞争使落后产能不断被淘汰，企业规模经济效应越来越明显。规模化生产使陶瓷业逐步向规模化方向转型升级。截至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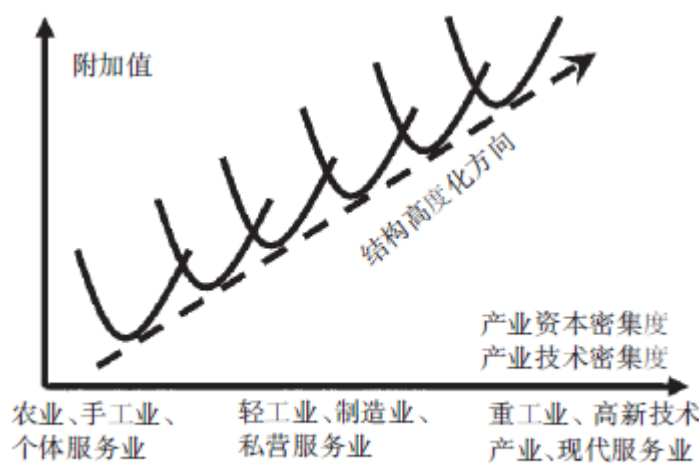


图 3 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

年,佛山 346 家规模以上陶瓷企业创造了 340.30 亿元工业总产值和 96.34 亿元工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市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的 6.2%和 7.4%。平均每家企业的工业产值近亿元,从业人员超 300 人,佛山陶瓷产业的加工度和附加值水平已经达到一定水平。

但随着自然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资源与环境取代了技术要素成为制约佛山陶瓷产业进一步升级的主要障碍。由于陶瓷生产是典型的资源消耗型产业,在工业较发达阶段,难免会遇到资源和能源方面的要素约束,出现如图2所示的“资源壁垒”。2003—2005年,受要素资源短缺和价格上涨的影响,佛山平均每年都有近10家陶瓷企业停产、关闭。而且传统陶瓷产业的废气排放量位居佛山各行业之首,二氧化硫排放量居第二位,工业粉尘排放量居首位,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为此,佛山市陆续推出了相关产业政策,主要包括:2003年的产业强市战略、2004年的《关于加快推进我市陶瓷产业调整提升工作的通知》、2008年的《佛山市陶瓷产业结构调整的评价方案》和《佛山市陶瓷产业扶优扶强若干政策措施》。整个佛山市(除禅城区外)自2003年起,停止了对新建、扩建陶瓷项目的审批。

佛山陶瓷企业不得不从生产方式革新和技术进步出发,以产业升级来扭转产业衰退的下滑轨迹。在2003—2007年的短短4年间,佛山陶瓷企业就新建了6个企业技术中心,其中3个是在2006 年后起步的;建成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14个;9家大型企业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近50个企业成功申报民营科技企业。以技术要素为主导的产业升级,使陶瓷产业对原材料——瓷土的加工程度升高了,产品附加值随着产品结构升级而逐步提高。2007年,佛山规模以上陶瓷企业的生产附加值(工业增加值除以工业总产值)由2005 年的28.3%上升到30.0%,利润率从4.0%上升到5.9%,人均工业产值从32.0 万元上升到49.5万元。到了2009年,全佛山陶瓷企业只剩下100多家,但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利润总额却比2007年366家的总量还多。在短短数年内,陶瓷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完成了加工程度高度化产业升级的第二步,使产品的加工程度、附加值有了大幅提升。

本文把这种主要依托产品技术含量和单位附加值提升而在产业内部进行的高附加值和高加工程度的产业升级历程,归纳为“加工程度高度化的产业升级模式”——随着要素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特别是低技术劳动、水电能源、土地和自然资源等低端要素的稀缺程度提高,同时技术、高技术劳动等高度要素的价格下降,企业通过不断提高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将制造加工环节做到极致,不断提高制造环节的附加值,技术、产品结构素质,从产业内部实现产品附加值升级和生产加工程度高度化的产业升级模式。加工程度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的作用机制见图4。佛山陶瓷产业以技术提升单位产品附加值,虽然没能抢占以意大利等国为首的国际研发设计市场(上游价值链),也没能在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品牌营销方面(下游价值链)作出重大突破。但产业却依然能够在短期大幅提升附加值和利润,使用的正是加工程度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

3.3 价值链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 3

产业升级实质上是国家改变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从而改变自身在生产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本文认为产业改变所在的生产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位置也是产业升级的一种主要模式。以汽车产业为例,日系三大整车企业(本田、日产、丰田)相继落户广东。2000—2008 年广州汽车工业总产值从125.56亿元猛增至1850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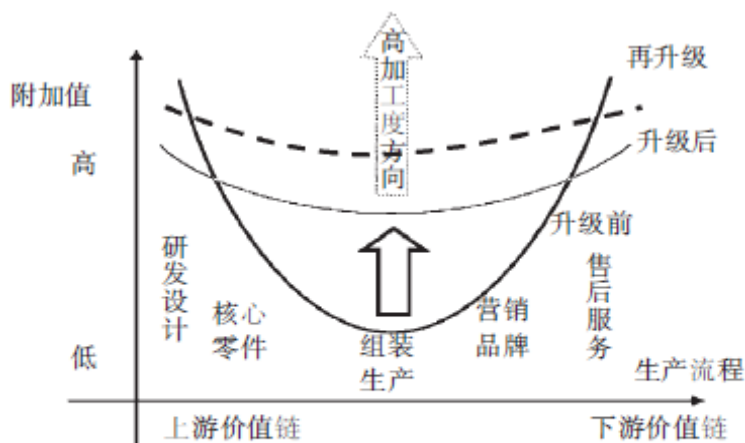


图4 加工程度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

每年将近翻一番半。据广州汽车行业协会统计, 尽管遭遇了国际金融动荡, 2009上半年广州的广本、广丰和东风日产三大汽车企业, 共销售汽车46.74万辆, 同比增长21.19%。同时大量日资、日系汽车零部件企业进驻广州、佛山等珠三角地区。

汽车产能的扩张必然导致零部件市场的需求增长, 在国际汽车产业经验惯例中, 整车制造与零部件的合理规模比例是1:1.7, 零部件产业所形成的合理产值应大于汽车制造业的产值。但在2008年广州汽车制造业总产值的1850亿元中, 零部件产值比重不到四分之一。1:0.25的整车与零部件产值与发达国家水平比有不小的差距, 甚至比2004年的1:0.3还上升不少。当然, 广州主要集中的是整车制造企业, 而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地区主要集中的是汽车零部件企业, 所以单单考察广州可能高估了广东省的整车与零部件产值比。根据2007年出台的《广东省汽车工业发展规划》, 2010年广东汽车产业的整车与零部件产值比要达到1:0.8, 即使这个目标也远达不到发达国家标准。

从整车制造到零部件生产实质上是汽车制造业从“微笑曲线”价值链的附加值最底端“生产组装”, 向上游价值链的附加值高端“核心零件”爬升的产业升级过程(即从图5的“微笑曲线”中间向左端的高附加值区爬升)。由于日本汽车产业链的封闭性, 日系汽车很多核心零部件都是从日本本土进口, 或者由广州地区的日资零部件企业生产。日系汽车生产体系封闭直接导致了日系汽车与区内本土制造业没有形成很好的产业配套和协作关系。甚至可以说, 广州、佛山地区的日资零部件企业占据整个地区汽车产业上游价值链的绝对主导地位, 对国内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如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长期从事着汽车零部件生产, 但是在对日系整车企业的零部件供应中, 它只能做二级供应商, 必须将产品卖给日资零部件公司经过加工后才能卖给日资整车企业。同时国内零部件企业为了更好地供应日系品牌零部件和整车制造厂, 都采取贴近日系车的生产标准, 甘愿做日资企业的二级供应商。日系汽车产业链对零部件技术进行了严密的封闭管理, 核心零部件仅限于日系品牌内使用, 甚至完全不对外部企业出售产品。如广州本田的一级供应商“昭和”就会从佛山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采购一些初级部件, 然后在本厂加工组装成核心零部件再供应给广州本田, 从而很好地保护了其技术专利。甚至有日系汽车企业的中国籍管理层戏言所在企业“连一个扳手都要进口”。

这样一来, 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不要说向价值链最上游“研发设计”端爬升, 就连要做到核心零部件生产和初级零部件深加工也极为困难, 整车制造所需的核心零件均为进口, 价值链高度化的产业升级谈何容易。据海关统计, 2008年广东省进出口汽车配件37.8亿美元, 与2007年相比增长20%, 广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进出口集散地之一。核心零部件进口、产业链的技术封闭以及日企之间的财务处理, 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零部件产值比重低下, 远远达不到国际水平, 甚至出现逐年下降。2008年广东汽车零部件产业以外资企业为主体, 60.98%的外资比重比浙江、江苏、上海、

山东、吉林这五个汽车制造大省市都要大得多, 从侧面反映了这种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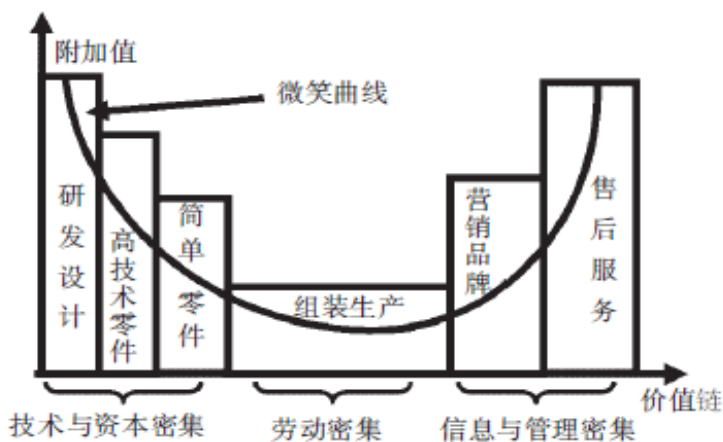


图5 价值链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

本文据此判断, 外向的资本结构会对产业向高端价值链爬升产生巨大的制约作用。产业升级要克服这种强大的制约作用, 向价值链高端爬升因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幼稚期, 通过引进外资急促实现规模经济, 是不能引领这个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爬升的。只有逐步提升在位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才是价值链高度化产业升级的根本手段, 而适度调整资本结构也是

一个重要因素。在产业内部的“微笑曲线”价值链中,企业从生产流程中游的低附加值端“组装生产”,向上下游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端转化升级的过程,我们把它归纳为“价值链高度化的产业升级模式”——随着战略性要素资源的优化,在嵌入产业价值链中逐步向高附加价值的微笑曲线两端攀升(见图 5)。

4 政策建议

4.1 产业升级的“腾笼换鸟”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模式

珠三角地区 2008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711.45、14964.6、14069.52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为 2.4: 50.3: 47.3 的“二、三、一”型;香港的 2008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6.13、1158.9、13818.55 亿元人民币(以年平均汇率换算),三次产业结构为 0.04: 7.66: 92.3 的“三、二、一”型;而包括香港在内的“大珠三角”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是 1.6: 36.0: 62.4 的“三、二、一”型。倘若把香港这个第三产业极度发达的地区放入珠三角整个区域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大珠三角”从“二、三、一”向“三、二、一”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升级过程其实已经完成。这时,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想要在短期内大力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的可能性较小,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升级模式(比如“腾笼换鸟”式升级)因而会受到一定制约。今后珠三角地区乃至广东的主要产业升级模式很可能会从产业结构高度化转至加工程度高度化的产业升级模式。

4.2 产业升级的“链条升级”与价值链高度化模式

“链条升级”的产业升级模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的科技研发能力和高端的运营管理水平。但在广东,低下的科技研发能力以致广州汽车制造业还是在走产能规模扩张的老路,品牌营销能力的不足使“美的”作为世界家电生产的龙头企业,出口产品却仍旧以贴牌生产为主。是企业不愿意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的汽车发动机、制动系统等核心零部件,也不愿意销售自己品牌的产品从而在国际打响品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是现实的市场环境,让企业理性地选择了低端加工和贴牌生产的利润最大化道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运营管理水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工程,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链条升级”可能还不会是广东产业升级的主要模式。

4.3 产业升级的“资源替代”与加工程度高度化模式

总而言之,对广东较为有效的产业升级模式几乎只有加工程度高度化模式。随着当今资源、土地等低端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之际,广东制造业已经自发开始了这种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资源替代”型产业升级模式——企业通过引进自动化程度更高、劳动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来部分替代劳动,产业以技术、资本替代劳动、自然资源的整个产业在既定产品和生产链条上提升附加值和加工程度。以“资源替代”促加工程度高度化的产业升级很可能将是今后广东产业升级的主要模式。

作者:朱卫平 陈林

来源:《经济学家》2011 年第 2 期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模型 及案例分析



1 引言

物流企业集群是指那些以专业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物流企业,通过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或靠近而形成的一个整体。目前,我国以开发区、保税区、港口、机场以及传统物资储运企业为轴心,已经形成一些颇具规模的物流中心和物流园区等物流企业集群,这些集群在我国区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自然优势为初始条件的物流企业集群,要想获得延续和繁荣,必须不断提高物流服务的效率,进行物流服务创新。

物流企业集群的服务创新过程涉及到多种因素,是一个多变的复杂随机过程,其行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传统的基于还原论研究创新的方法,较难适用于研究物流企业集群的服务创新过程和行为演化。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研究脉络,发现集群创新研究已经开始与复杂系统的涌现性研究结合起来了,以Rycoft 和Kash(2000)、Chiles(2001)、白世贞(2008)、张智勇(2009)等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已经体现了这种结合特征。本文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的状态层级模型,并结合我国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的成功范例——天津保税物流园区,剖析其演化过程,试图为我国物流企业集群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创新型物流园区、创新型国际物流枢纽的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2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系统构成要素分析

根据复杂系统理论,本文提出如下观点:首先,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而且表现出整体演化特征,即整体中的物流企业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凝聚,这种凝聚远远超过了独立企业间相互作用的简单叠加之和,改善了各企业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从中受益,充分体现了物流服务一体化、网络化、规模化发展的趋势;其次,服务创新行为是该复杂系统呈现的一种整体演化过程,即在某种或多种毫不相关的物流服务创新规则支配下,物流企业集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不断优化、协调其结构与功能,促使群内物流企业服务环境、服务技术、服务过程等得到改善与优化,并生成新的、原有企业所不具备的、更完善的服务创新行为模式与机制。根据在服务创新中的定位和作用方式不同,我们把物流集群服务创新系统的构成分为核心层要素、辅助层要素、外围层要素三大类。

2.1 核心层要素

核心层要素是指物流企业集群的核心创新主体集合,即是集群中的相关物流企业集合,是将供应商企业、制造商企业、批发商企业、零售商企业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物流网链结构,该网链结构中每一个物流节点企业通过相关的信息网络、竞争合作、物流价值链、或其他内部联结模式实现互动,从而带动整个物流企业集群的集聚和发展。

2.2 辅助层要素

辅助层要素是指物流企业集群的服务创新支撑体系，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其中软件部分分为物流信息平台、公共服务机构和集群代理机构。辅助层的支撑体系是为核心层的创新主体提供硬件、信息、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服务的外延支撑，服务于集群创新系统的持续创新产出。

2.3 外围层要素

外围层要素指物流企业集群的创新外部环境体系，包括政府机构、社会文化环境、地理区位优势、法规政策环境、外部市场环境等。外部环境体系为物流企业集群的创新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尤其是在物流企业集群创新初期，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和限制。上述三大类要素及其因素变量可以用表 1 所示的系统要素模型来描述。

表 1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系统要素模型

层次要素	构成因素	因素变量
核心层要素 (核心创新主体)	物流企业	运输、仓储、货货、报关、配送、加工等物流功能提供者
	供应链企业	供应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连锁超市等
	竞争企业	产品竞争或互补企业
	用户企业	产品(中间产品)需求者
辅助层要素 (创新支撑体系)	物流硬件设施	基础设施:港口、码头、铁路、公路等
		技术装备:运输、装卸搬运、仓储、包装、加工等装备
	物流信息平台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客户服务系统、电子商务平台等
	公共服务机构	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机构、实验室和大学、 人力资源与培训机构、金融服务机构等
	集群代理机构	物流协会、物流企业家协会等
外围层要素 (创新外部环境)	政府机构	地方科委、经贸委、发改委等
	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就业、生活质量、伦理道德、社会规范、价值观等
	地理区位优势	地理位置、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科技水平等
	政府政策环境	税收制度、贸易政策、金融政策、技术交易和其它法律等
	外部市场环境	社会需求、消费者偏好、竞争对手、市场竞争等

3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的框架体系

3.1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作用路径分析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物流服务创新常常被理解为引进一种新产品或新技术、获得一种原材料的新供给、生产组织方法上的一种新发明及其应用等，主要强调实现服务的技术因素创新。这种只有技术因素的服务创新并不足以帮助物流企业集群创建全新的物流设计、服务和产品，还需要融入非技术因素，如战略创新、组织创新、理念创新、功能创新、体制创新，才能切实实现物流企业集群的服务创新。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作用路径，应该从制定创新战略开始，综合协调创新组织和团队的创建、创新理念和文化的倡导、创新功能的设计、创新体制的建设等方面，全面考虑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各类形式的创新，以提高物流集群核心竞争能力为目标，整合物流资源、优化创新结构，实现物流集群服务创新系统各要素单独所无法实现的价值增值、竞争合作、全面协同的创新效应，促进整体物流集群创新绩效的提升。

3.2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方式分析

根据表 1 可知,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是一个包括了多元化创新行为主体交互性的系统工程,需要集群服务创新系统各要素,包括核心层、辅助层、外围层三大类要素的协同和有效配置,并及时根据物流集群的服务创新战略调整要素间结构。集群内物流企业需要与其它组织(譬如供应链企业、竞争企业、用户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相互作用,同时也要与其支撑环境和群外环境协同作用,正是这种不同主体和机构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使得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系统整体演化行为得以演进,呈现出物流价值链创新、物流产学研合作创新、以及物流集群本身与其支撑环境和外环境的协同创新。根据上述分析,构建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框架体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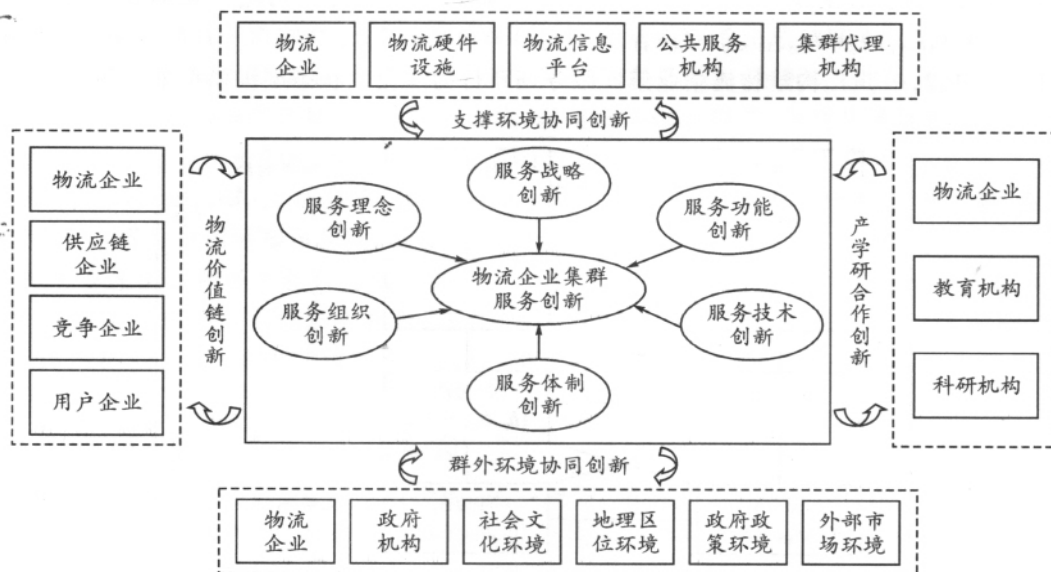


图1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的框架体系

(1) 物流价值链创新。迈克尔·波特(1985)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他指出价值链就是从供应商开始,经过生产加工,直到顾客价值实现的一系列价值创造、价值增值活动和相应的业务流程。借鉴迈克尔·波特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物流价值链就是基于物流价值增值,由企业、供应商、用户以及物流服务提供商组成的供应链;物流价值链创新就是物流集群核心层要素,以所有合作伙伴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核心能力的优势互补为基础,多方面、深层次地开发与价值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长期战略关系,实现服务战略创新、服务组织创新和服务理念创新。

(2) 物流产学研合作创新。物流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指物流企业集群与教育或科研机构利用各自的要素占有优势,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一项技术创新的行为,它被认为是物流企业集群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物流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关键是知识在集群内的流动和共享,物流集群在进行技术、战略和组织结构方面的服务创新时,可以吸取和整合教育及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成果。

(3) 物流集群与环境的协同创新。处在多变的环境中,物流企业集群只有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适应性的学习和演化,才能保证其生存发展。同时,具有学习能力的集群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着环境,从而使二者之间不断进行信息的交流与融合,产生协同创新。这种协同创新表现在两方面的协同,一方面是物流集群与辅助层支撑环境的协同创新,即物流企业集群需要获得物流硬件设施、物流信息平台的基础保障支持,也需要公共服务、集群代理等机构的咨询协调支持,从而实现服务功能创新;另一方面是物流集群与外围层群外环境的协同创新,即物流企业集群需要获得政府机构、社会文化、地理区位等外环境的政策、法规的支持,从而实现服务体制创新;同时,物流企业集群反作

用于支撑环境和外环境, 促其不断创新和发展。

4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的状态层级模型

根据图1所示框架体系,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按照价值链创新、产学研合作创新、以及集群与环境协同创新的方式相互作用, 推动了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的演化。基于复杂系统的涌现机理, 这种演化行为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和状态, 每一层次的状态具有特定的行为, 遵循特定的策略规则。

假设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层次有 n 个层次, 每一层次有 n 个状态, 对应 n 种行为, 遵循 n 个策略规则, 形式化为状态集 $S_i = \{s_{i1}, s_{i2}, \dots, s_{in}\}$, 行为集 $B_i = \{b_{i1}, b_{i2}, \dots, b_{in}\}$, 策略规则集 $F_i = \{f_{i1}, f_{i2}, \dots, f_{in}\}$; 并且, $s_{ij} \neq s_{i(j-1)}$, $b_{ij} \neq b_{i(j-1)}$, $f_{ij} \neq f_{i(j-1)}$, $s_{i1} \cap s_{i2} \cap \dots \cap s_{in} \neq \Phi$, $b_{i1} \cap b_{i2} \cap \dots \cap b_{in} \neq \Phi$, $f_{i1} \cap f_{i2} \cap \dots \cap f_{in} \neq \Phi$; (其中 $i, j=1, 2, \dots, n$)。构建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的状态层级模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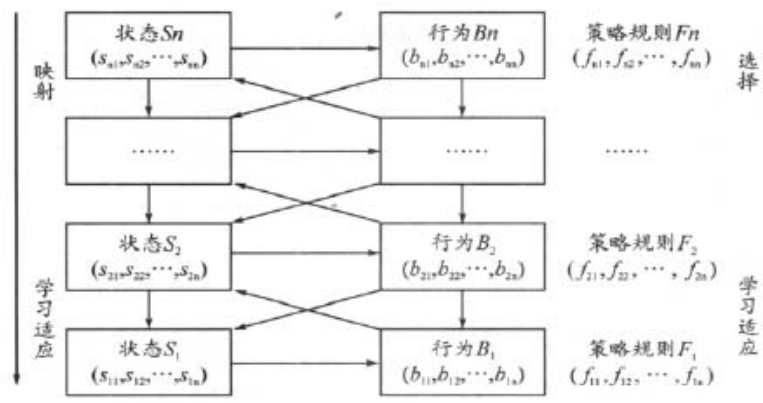


图2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演化的状态层级模型

4.1 映射和学习适应过程

首先, 在同一层次内, 状态决定行为, 每一个状态通过转换函数 $F = \{F_1, F_2, \dots, F_n\}$, 都与其行为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是一种函数映射关系, 形式化为 $B = F(S)$ 。

其次, 在不同层次间, 状态与行为有交错关系, 下层次状态受其上层次状态和上层次行为的影响, 这是学习适应的过程, 通过对上层次行为的学习而改变自己的状态, 这个过程可以形式化为 $S_i = F(B_{i+1})$ 。

从总体来看, 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的整体状态会直接影响中间层次的状态, 这好比上级向下级下达指令, 使下级产生反映; 又好比人们必须遵守自然法则一样。这样上层次状态可直接作为下层次状态的输入, 这是从整体到部分的路径, 是一个映射和学习适应过程, 该过程可形式化为 $S_i = F(S_{i+1})$ 。

4.2 学习适应和选择过程

首先, 上层也要适应下层的行, 表现为上层的状态随下层的行而改变, 这个适应过程可形式化为 $S_i = F(B_{i-1})$ 。

其次, 上层行通过选择来评价决定下层的行, 从而使下层中不适应上层的行被淘汰; 这是一个系统内部的、主动的选择过程, 该过程可以形式化为 $B_i = F(B_{i-1})$ 。

综上, 以上四类转换关系: $S_i = F(B_{i+1})$ 、 $S_i = F(S_{i+1})$ 、 $S_i = F(B_{i-1})$ 、 $B_i = F(B_{i-1})$ 都是非线性的; 同时从图 2 可以看出, 从任何一处出发, 都至少存在一个反馈环。事实上, 正是在这种上、下层之间非线性的反馈、映射、学习适应、选择的作用机制下, 通过转换函数(策略规则 F_i 在演化中可以不断修正), 使各层次之间、每一层次之内的各创新主体间的状态、行为相互协调, 不断演化, 到最后呈现出整体宏观的创新行为。

5 案例分析: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服务创新行为演化过程

1989年天津港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商业保税库(简称CBW), 开始探索港口功能的拓展, 提升区域现代物流水平;1991年国家批准设立天津港保税区, 开始了自由贸易和现代物流结合,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索;1996年在全国保税区中率先建立分拨中心, 使港口与保税区间物流更简便;2004年国家批准设立天津保税区物流园区, 进行区港联动试点。2005年经国家六部委验收组验收通过, 园区开始封关试运行。2006年 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保税物流园区的管理办法》开始生效, 园区也同时进入正式运作阶段。园区位于保税区东北侧, 面积1.5平方公里, 该物流园区的外沿距离港口海岸线仅700米, 紧邻东部集装箱码头和滚装船码头。20年来, 园区以建设“立足天津, 依托京冀, 服务环渤海, 辐射‘三北’, 面向东北亚的国际物流中心”为目标, 不断改善通关环境, 拓展园区功能, 创新发展服务模式, 提高物流周转速度、增强物流国际化竞争优势。区内企业由最初的13家增加到目前的33家, 注册资本达8000万美元, 总仓储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物流辐射北京、天津、河北、苏州、常州、上海、杭州、深圳等省市, 新加坡锦佳、叶水福、瑞士名门、川崎振华、东方海外等一批国际知名物流企业纷纷落户园区。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服务创新行为演化经历三个阶段, 即蓄势待发阶段、强势扩张阶段和国际化运营阶段。服务创新因素除技术创新因素外, 还包括非技术创新因素, 即战略创新、组织创新、理念创新、功能创新、体制创新, 由此构成其创新作用路径。构建天津保税物流园区服务创新行为演化过程如表2所示。

5.1 园区服务创新的蓄势待发阶段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建设之初, 由政府投资、统一规划、牵头开发, 采取 BOT(修建—营运—移交)的方式, 引进、模仿国外先进技术, 对园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进行开发和建设。并由政府设立天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监督和管理园区的开发建设以及区内企业的日常运营;同时设立货物分拨中心, 简化了保税区到天津空港和北京空港的货运手续, 降低了物流成本。园区通过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和低廉的土地价格, 吸引大量物流服务企业入区投资建厂, 开展业务;入区企业除了自建厂房, 还可以向管理委员会租赁库房、堆场、车间等基础设施;园区不断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 优化整合物流资源, 向区内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如信息、招聘、培训等更多的物流附加价值, 以提高物流运作效率。

5.2 园区服务创新的强势扩张阶段

2006年,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进入正式运作阶段, 其服务创新也进入强势扩张阶段, 在对国外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园区投入 300 多万元加强信息化建设, 构建了通关便捷、服务完善、管理规范有效的海关监管平台;重视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 培植核心企业, 打造集群品牌, 吸引了三星电子、摩托罗拉等知名物流企业落户园区;发挥区位优势, 物流辐射范围涵盖世界众多国家和国内绝大部分省市,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物流基地的地位逐渐显现。同时, 园区在海关和港口集团的支持下, 实现了货物从港口到园区的直提直放, 减少了货物存放时间和报关层次, 提高了物流运作效率, 降低了企业成本;将港口功能引入物流园区, 在中转集拼方面, 可以对中转集装箱进行拆、拼箱, 改变了以往在港区只能整箱进出的状况, 实现了集装箱综合处理以货物分拨、分销、配送等业务

的连动。物流园区实行封闭管理，专门发展仓储和物流产业，同时兼有加工贸易业务，使园区既有仓储物流功能，也有生产加工功能，甚至有商品展示功能，使物流功能得到了很大提升。

表 2 天津保税物流园区服务创新行为演化过程

创新演化过程 创新作用路径	蓄势待发阶段	强势扩张阶段	国际化运营阶段
技术创新	● 引进、模仿国外先进技术 ● 物流技术的渐进创新	● 消化吸收、二次创新 ● 加强物流信息化建设 ● 建立海关监管系统	● 网络化管理 ● 电子化通关 ● 电子化监控
战略创新	● 政府投资、统一规划、牵头开发 ● 采取 BOT（修建 - 营运 - 移交）的方式 ● 构建集商流、物流、信息流于一体的服务新平台	● 构建我国北方重要物流基地 ● 发挥区位优势，吸引知名物流企业落户园区，比如三星电子、摩托罗拉等 ● 发展第四方物流	● 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 ● 建设国际化物流中心 ● 与国际“自由贸易区”接轨
组织创新	● 设立天津港保税区 ● 建立货物分拨中心 ● 设立天津保税物流园区	● 海关监管 ● 港口支持	● 区港联动 ● 自由港、自由贸易区
理念创新	● 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更多的物流附加价值 ● 整合物流资源，提高物流运作效率	●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 重视产学研合作创新 ● 培植核心企业，打造集群品牌	● 可持续发展 ● 规范化、集约化 ● 大口岸、大通关、大辐射
功能创新	● 向区内企业提供物流配套服务，如信息、招聘、培训等	● 引入港口功能 ● 实行封闭管理 ● 发展仓储和物流产业 ● 兼有加工贸易业务	● 提供全方位功能服务 ● 实现物流一体化运作
体制创新	● 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 ● 提供低廉的土地价格	● 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 出口退税	● 加快通关速度和完善出口退税 ● 享受只有自由贸易区才可享受的优惠政策

5.3 园区服务创新的国际化运营阶段

2009 年，天津保税物流园区继续加大物流信息化建设力度，实现了网络化管理、电子化通关、电子化监控，通关数据一次录入、多次使用、信息共享;对进出园区货物采取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营造了大口岸、大通关、大辐射的现代物流发展环境;园区推出了加快通关速度和完善出口退税的一系列举措，国际中转业务大幅上升;目前，园区分拨货物总货重 5.19 万吨，总货值 8.7 亿美元，其作为国际物流中心的地位逐渐显现，基本实现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功能。同时，园区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物流产业规范化、集约化为目标，充分发挥区港联动的优势，以保税、报关、仓储为中心环节向两端延伸，逐步形成综合配套优势，提供全方位功能服务，充分实现国际物流一体化运作。

6 结论与启示

服务创新是物流企业集群持续开拓市场，形成新竞争优势的有力武器;也是提升物流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在物流企业集群服务创新行为的演化过程中，遵循“映射—学习—适应—选择”的创新机制，各创新主体的状态、行为相互协调、不断演化，表现出不同阶段的创新行为演化特征，使得服务创新系统整体演化行为得以演进，到最后呈现出系统整体的宏观创新行为，即集群内各物流企业和谐发展，物流集群不断壮大，竞争优势地位显著提高，这正是物流企业集群演化的趋势和规律，也是现实的选择。

作者：慕静
来源：《物流管理》2012 年第 1 期

加强技术经济管理提高电网投资效益

技术经济及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也适时提高了对中央企业经济效益的目标与要求,逐渐从以考核单一净资产回报率为主转向以考核 EVA 指标为主。为了迅速适应变化了的宏观政策,国家电网公司也提出要大力转变发展模式,加强对投入产出、经济效益、资源优化和运作效率的重视程度,从 2008 年起,正式将对上海市电力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的考核指标定为投资回报率。面对新形势,公司必须从“规模领先、投资驱动”的发展旧模式向“管理领先、效益提高”的发展新模式转变。

1 国家电网建设的基本状况

电力投资失衡一直是个突出的问题,电网投资的力度远远不及电源投资,电网投资低强度、小力度的特点已经成为电力工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历史资料显示,“八五”、“九五”期间,电网投资分别只占了电力投资的 13.7%和 37.3%,“十五”期间,由于 2004 年出现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更多的资金被投放到电源领域,加剧了电网、电源投资比例的失衡,2005 年,电网投资比例不足 30%,这与发达国家电网投资占 55%的比例相形见绌。然而,自国家 4 万亿政策性投资政策的实施以来,电网投资的比例大幅提升,到 2008 年底,电网投资额已达 2 884.56 亿元,同比增长 17.69%。“十一五”规划以来,电网投资额逐年递增,电网建设始终维持在较大规模。2006 年,全国实现电网投资 2 105.75 亿元(人民币),2007 年为 2 451.40 亿元,2008 年则升至 2 884.56 亿元。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计划 2009 年对全国电网投资 3 376 亿元。

近些年来,在电网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特高压电网也加速了发展步伐。2009 年 1 月,国家首个特高压电网工程——1 000kV 晋东南—南阳—荆门交流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投入运营,标志着中国的交流特高压电网工程迈入百万伏级,这在世界上是首创,预计投资 58 亿元。另外,两条总投资超过 400 亿元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也正在建设当中。此外,向家坝—上海±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已全线开工,这是目前世界上规划建设的电压等级最高、输送距离最远、容量最大的直流输电工程,预计 2010 年运投。四川锦屏—江苏苏南±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 2012 年建成。“十一五”以来,已有超过 1 万亿的资金流向电网建设。到 2010 年,国家电网特高压及 500kV 跨区、跨国电网联网的完工将促使跨区输电容量达 7000 万 kW,是 2005 年的 6 倍多。

2 中国电网建设中所遇见的问题

2.1 设计深度及预算编制工作不够深入

地质勘探深度不够、结构设计准度不够,使得“两型一化”、“两型三新”、“三通一标”等基建标准显得比较无力。滞后的施工图预算编制,不利于控制工程的造价。建设管理人员的配置达不到业主要求,难以满足繁重工程建设任务的需要。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变更提供合理的造价分析,没有按要求的限额和规定的步骤进行会签认证。施工图审查的优化设计和降低造价意识缺乏。工程进度把关松懈,造成前后进度不一致,赶工现象频出,无形中提高了工程建设成本。

2.2 监理单位的投资控制存有短板,智能电网标准体系尚不完善

施工图的优化和盲目投资问题一直未解决；监理核量不核价的行为使得监督检查力度大打折扣；经济与技术脱节：投标报价是规范工程量清单和实体的综合单价，签证量则为施工单位大开挖的工程量，量与价并不匹配。同时，中国智能电网体系还不够完善，为保障智能电网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完善国家智能电网标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2.3 配套政策缺乏，相关中介素质有待加强

“上网电价法”迟迟无法面世，新能源上网电价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由于新能源发电量占电力总量比重越来越大，上网电价的不固定性将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2008 年第四季度以来，各地均加大了对电网的投资规划，纷纷新增、改建、扩建电站及输电线路。这中间出现了一系列重复建设现象，应提高电网投资规划的审批门槛，确保资金能切实改善当地区域和总体电网结构。

招标代理单位的行动要按照招商流程规范进行。严格审查招标文件，绝不放过勘误未纠、取费违规、清单无法到位等项目。保证高质量的招标文件编写，做好风险规避工作。加大对电力行业的定额及计费体系的熟悉程度，提高对施工单位报审结算中高估冒算、高套单价、重复计算工程量等问题的敏感性。

3 提高电网投资效益的策略

3.1 加强中国经济的导向作用

投资管理优化原则明确表明：公司制订投资计划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投资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具体说来，就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主要由投资总盘及结构确定和大型项目排序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牢牢把握公司整体目标这个大局，通过运用统计回归法合理预测投资预总盘及公司的财务能力区间值。围绕公司具体经营目标，如售电量、电网安全、到龄资产等重要指标，提出投资预总盘的合理值。从而给出各专业条线部门和下级单位上报项目时提供投资金额上限的参考值，检验公司投资的可行性。与此同时，财务部以售电量、留存收益和净利润作为输入条件，提出初步的公司投资能力区间值。准确量化公司在具体经营目标下的投资能力及其可操作性。其次，通过调研提出以“经济导向”为目标的项目排序打分方法。保证在资金紧缺、效益欠佳的严峻形势下，本部管理的基建、更改类资本性支出项目有比较全面的排序方法。从而实现对部门项目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全面衡量，使得投资计划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

3.2 加强中国电网的智能管理

以强大的 ERP 系统为支撑，囊括了从项目研发到工程转资流程中关于投资、财务、工建等各方面的数据信息。公司通过这个信息平台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和功能，通过智能化的系统操作保障流程补漏评估方式的实现，不仅提高了系统利用率，而且解放了人力资源，大大提升了管理效率。首先，挖掘开发系统中存在的信息资源固化比对方式。比如在“工程造价规范”工作模块中，设计同行业的单位工程造价比对表，将同项目的工程单位造价计算并汇总。通过系统取得各项工程决算数据和工程类型参数，自动生成核对后的单位工程造价比对表。其次，匹配系统的有效资源，科学提供监控内容，落实责任制。比如在“资金支出与工程进度匹配”工作模块中，对资金支付超出或落后于进度的情况进行严格监测。其系统操作为：从 SAP 系统中选取资金支付信息，从一体化的建设体系中选取工程重大节点信息，使两者在信息平台上构建对应关系并生成相关报表。

3.3 优化中国资源配置，提高提升电力投资效益

优化中国资源配置，提高提升电力投资效益，应该按照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原则，合理分配投资。为突出各供电公司的电网需求热点，公司在具体分配基层投资中的增容投资时，将供电

公司进一步细分成 254 个地块，以此为标准来科学量化分析电网的现状与发展潜力。做到重点区域重点投资。这样一来，那些处于电网发展成熟、组装先进且平均负荷相对较低的市区供电企业的具有隐含负荷热点问题的个别地块也不会被平均负载较低的总体状况所掩盖。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中国在电网投资力度得到了不断的加强，特高压电网也实现了加速。但中国电网建设中还存在着“设计深度及预算编制工作有待深化；监理单位的投资控制存有短板，智能电网标准体系尚不完善；相关中介素质有待加强；配套政策缺乏，重复建设频出”等问题。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即必须加强中国经济的导向作用，加强中国电网的智能管理，优化优化中国资源配置，提高提升电力投资效益。

作者：林丽琼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1 年第 15 期

高等院校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探讨



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是解决当前会计人才培养结构性过剩，确保我国高校会计教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基本途径，本文对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整合等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1 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意义

特色专业是指高等院校在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过程中，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明显特色，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有较高声誉的专业。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角色转换过程中，特色专业建设成为高校求生存、谋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只有基于会计人才需求的现状，以就业为导向，结合高等院校自身教育资源和特色，设定培养目标，合理安排课程模块和课程体系，培养教师队伍，实施培养方案，才能确保我国高等院校会计教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所需的各层次人才。

2 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的内容及措施

2.1 专业建设理念创新

特色专业建设是一项涉及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和教材、师资队伍、教学设施和资源等多方面的教学改革活动，专业建设理念是指导特色专业建设的理论思想，对于特色专业建设的方向、进程和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计学专业是一门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在当今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传统的办学理念已经很难适应这种教学改革和创新活动，因此，应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现实，更新专业建设理念，用于指导和规范专业建设过程中的各项活动。

2.2 培养目标确定

会计学特色专业的培养目标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着眼于新兴产业和先进技术的中长期发展态势, 立足自身特色进行合理规划和设置, 因此, 在培养目标确定时应该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 分析社会紧缺的会计学专业各层次人才特征及其他院校会计学专业设置情况, 优化专业方向, 确定培养目标, 形成自身人才培养特色。目前, 会计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有侧重技术实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及侧重理论研究的学术型人才培养。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中, 应关注与其他院校的差异化, 针对社会需求及会计岗位特点, 培养基础扎实、业务熟练的会计人才; 在学术型人才培养目标中, 在教授系统专业知识的同时, 应注重培养学生吸收会计学专业前沿知识和专业创新的能力。

2.3 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

在培养目标的基础上, 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是体现专业特色, 保证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培养方案应体现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的本质内涵, 注重会计学专业知识体系的结构优化, 及其与理财、生产运作管理、商法、计算机应用、金融市场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课程设置是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的载体和保障, 一方面, 需要体现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另一方面, 考虑到会计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 应设置相应的系列仿真实训课程, 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并根据实际情况, 积极培育精品课程, 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2.4 师资队伍建设

特色专业建设离不开具有学科特色的师资队伍。在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 应根据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大胆选聘人才, 对于与实践结合比较紧密的相关课程, 可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利用其实践经验丰富, 熟悉财务、会计实际工作的优势, 弥补校内教师实践经验欠缺的不足。与此同时, 各高校需要关注教师的培养和培训, 鼓励和支持教师利用假期参加与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有关的企业实践工作, 提高其在特色专业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能力。

2.5 教学资源整合

充分利用校外教学资源, 建立以会计师事务所、各企事业单位为主体的会计校外实习和就业基地, 通过校企合作方式开发综合研究项目, 引入“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是实现会计学专业特色的有效途径。学生在这样的教学模式指导下, 可以将所学理论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工作, 同时, 从实践中发现会计学专业领域尚待解决的问题, 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3.1 突出专业特色, 实行差异化战略

目前, 我国多数高校都开设会计学专业, 高校培养的会计人才与社会需求在总量上差距已经不大, 但存在结构层次上的失衡, 具体表现为大量会计学专业毕业生不能及时找到满意工作, 与此同时, 社会上许多会计岗位招聘不到合适的人才。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会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没有完全对接, 部分高校在会计学专业建设上比较雷同, 导致毕业学生在某些会计工作岗位上竞争激烈, 而一些社会需求的会计人才培养却出现真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实行差异化战略, 突出自身专业建设特色和优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 尤其是相同层次高校会计学专业建设情况的分析, 了解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方法, 为自身会计学专业建设的特色选择提供借鉴。

3.2 构建“学校、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会计学是一门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 在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 “动态追踪科学技术发展、创设真实企业环境、培养熟练会计职业技能”是获得和保持办学优势的重要手段。为此, 高

校应该针对其所处区域、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充分利用可获得的社会资源,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和会计实验基地建设,构建“学校、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3.3 建立特色专业建设评估与监控机制

由于特色专业建设的内外部条件经常发生变化,会计学特色专业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偏差,因此,高校、各主管单位、企业以及相关咨询机构可以成立特色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对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的教学资源配置、经费使用、专业建设运行情况、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等进行实时跟踪和监控,及时发现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找出问题出现的原因并督促进行纠偏,确保特色专业建设正常稳定运行。(注:本文系北方工业大学教改项目《会计学专业特色的培育研究与实践》;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项目)

作者:黄凌灵

来源:《商业会计》2011 年第 22 期

风险管理与金融危机： 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的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犹如一根导火索,使华尔街的金融巨擘们纷纷陷入困境,并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世界经济至今未能走出危机的阴霾。这场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各方关注:为什么西方经典金融理论、风险管理机制、监管体制会集体失灵?具有世界顶级风险管理技术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对危机却毫无防范?其背后显现出来的问题,发人深思。

1 金融危机的根源及风险管理机制面临的挑战

人们在解释危机时,往往把矛头指向抵押贷款人、对冲基金、信用评估、监管漏洞、衍生产品以及信息缺失等。但我们解决了这些和次贷相关的诸多问题,是否就能避免未来危机的爆发?毕竟,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储贷危机、拉美银行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对经济的影响至今使人记忆犹新。人们关于防范危机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但为何没能阻止危机的再次爆发?人们解决了此问题,又会出现彼问题,未来的危机可能不再以次贷形式表现出来,却又可能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只要当一种新的金融创新产生,又没有相应的监管制度规范它时,监管漏洞就会产生,而这又将成为下一次危机的隐患,因此,防范危机不能只从其表面入手,必须从其根源入手。

金融危机的出现显示出风险管理机制的不足,建立在传统金融学理论基础上的现代风险管理理论日益受到挑战。危机的起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乃是归因于人。归因于人们的“心理”,心理的泡沫比资产泡沫更可怕和难以战胜,且是资产泡沫、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避免危机的根本在于了解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心理,规范其行为。行为金融学的诞生,开启了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另一全新思路,必将成为传统风险管理理论的有益补充。

2 行为金融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对完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的意义

行为金融学，顾名思义是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之中。它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等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一研究视角通过分析金融市场主体在市场行为中的偏差和反常，来寻求不同市场主体在不同环境下的经营理念及决策行为特征，力求建立一种能正确反映市场主体实际决策行为和市场运行状况的描述性模型。

行为金融学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基于对市场经济复杂性的认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被经济学家们奉若神明的新古典范式。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核心假设是“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理性人假设将经济活动主体设定为是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每一个投资者均能够及时发现金融市场中的套利机会，使得金融市场处于理性价格之上。同时市场有效，市场信息充分反映在资产价格上，因此，其价格与其基本价值相符，均值回归，收益均衡。该理论运用数理逻辑与技术，演绎出一套投资者总是寻求“理性的线性、无偏和最优解”的完美金融市场运行机理和金融资产的定价模型，使其具有了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似乎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类似于某种封闭的热力学系统，时时处处都在“本能”地趋向均衡。

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观察结果表明，现实中存在着大量非理性、非线性、价格偏离、收益异常等无法用传统理论解释的“金融异象”，从而使经济金融学家对传统金融学理论提出质疑。

“金融异象”的产生原因在于新古典范式的简单性与市场经济复杂性的矛盾。现实中的金融市场远非新古典范式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而是一个由人的一切复杂活动及人与环境的复杂关系所组成的复杂系统。由于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并非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能完全理性地按照理论模型去行动，人的非理性行为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由有限理性的人组成的系统中，人的思维及其实施后果必然会作用于系统，使得系统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着蝴蝶效应、道德效应、风险逆选择效应等等，这一切使系统的微小动荡以几何级数的倍数放大。经济系统组元“活”的机制构成了系统高级的非线性机制。因此不能再将人的因素仅仅作为假设排斥在外，行为分析应纳入理论分析之中。

“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动摇了经典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它从人的心理和行为角度来解释市场行为，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

该学科理论通过对个人心理因素的研究发现：（1）由于市场各参与主体在利用信息进行决策时存在认知偏差，因而他们对市场的未来不可能做出无偏估计。其偏好是多样且可变的，这种偏好经常仅仅在决策过程中才形成；（2）由于市场各参与主体有回避损失减少后悔、推卸责任等心理，因而在决策时不可能总以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为准则，决策者追求的是满意方案而非最优方案。（3）在一定条件下，理性套利者会转化为噪音交易者，从而加大了风险资产的价格波动并削弱市场效率，套利的力量不可能不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剔除非理性行为对理性行为的实质性的长期影响，所以有效市场假说是不成立的。因此行为金融学认为，传统金融理论与实证分析的不断背离，是基于其前提假说的失败：投资者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认知的局限决定了人类存在着许多理性之外的情绪、冲动和决策。

如果说新古典范式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最优化的道路，让我们知道“应该发生什么”，行为金融学告诉我们的则是受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实际发生什么”，该理论能较为合理地解释经典金融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的金融市场“异象”，使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

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环境日趋复杂，建立在传统金融理论基础上的风险管理机制也愈显不足。借鉴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考虑经济风险中“人的心理”因素，将有助于建立更加切实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3 金融危机中的人因风险分析

行为金融学认为, 人们的某些社会心理特征可以很好地解释金融市场中热点频繁出现的现象, 市场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管理者在进行经营和管理决策时会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导致不良道德后果的行为偏差。从金融危机发展过程来看, 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 企业管理中钟情于“经济人”理论而带来的偏差。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认识偏差, 即自利的经济人仅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无需考虑分配是否公平。现实中企业家受上述主流经济思想的影响, 在认同“理性经济人”假设上存在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忠诚”。这一心理认识偏差可能带来的结果便是道德风险, 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正是产生资产泡沫并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

2000 年网络泡沫破碎后, 美联储为防止经济衰退, 采取了低利率政策, 刺激了居民的消费和信贷热情, 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同时银行等贷款机构面临的市场竞争和盈利压力加大。在利益的驱使下, 房地产金融机构产生了强烈的扩大住房抵押贷款供给的冲动, 在优质贷款客户贷款需求饱和后, 放贷机构开始放松贷款条件, 继续向资质差的借款人发放贷款, 使不良贷款比例攀升, 造成大量潜在坏账。为了转移风险, 放贷机构将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 转化为以各级房贷作抵押的 ABS 债券后, 出售给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则把 ABS 按照债务违约风险分割成不同级别各类债务抵押债券 CDO, 出售给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 立刻套现。为了稳定投资人信心, 投资银行自身也持有一部分 CDO 产品。出于对其违约风险的担心, 又开发了类似保险合同的 CDS 产品——信用违约掉期, 通过向愿承担 CDO 违约风险的一方分期支付违约保险金形式, 将自身风险转移出去。保险公司则通过单一风险保险 (Monoline Insurance) 和信用违约掉期 CDS 为次债提供保险, 从而提高了次债的等级, 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高风险次级债券被评级机构评为高等级债券, 进入银行、基金、保险公司、和国际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从 ABS 到 CDS, 在金融机构一系列吹起泡沫的过程中, 众多投资者成了不良资产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 风险被迅速传递到国际市场。

从整个事件来看, 钟情于“经济人”理论而带来的认识偏差, 使各类金融机构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无视他人利益, 在以利益链条为纽带,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金融环境下, 由自利心理产生的道德风险必将导致系统风险, 引发金融危机。

3.2 噪音交易。

在资本市场中, 由于非理性交易者的存在及信息的大量性特点, 交易者无法先验地判断信息的价值, 任何交易者都有可能把与价值无关的信息认为是与价值有关; 或者, 某些交易者人为地制造虚假信息, 使其他投资者无法识别其真伪而受到影响, 基于这两种情形的交易便是噪音交易。噪音交易的存在会对资产泡沫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产生的初期, 人们普遍对经济形势抱有过于乐观的估计, 市场被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虚假的利好消息充斥, 人们无法识别其真伪, 于是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进一步偏离其基本事实, 造成泡沫加剧。其次某些机构制造和利用虚假信息进行炒作, 在价格飙升的过程中牟取利润, 从而加速市场泡沫的形成和扩大。市场上, 房地产金融机构提供多种多样高风险的次贷产品, 这类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初始按揭低, 一定时间后按揭压力陡增。这样的次级贷款, 在地产业泡沫膨胀的背景下给消费者可以短期套利的错觉, 提高其贷款购房的热情。产品的高回报率、回报周期短吸引了越来越多无足够偿还能力的人参与到次级房贷市场中来。噪音交易的结果造成投资者对现实经济环境的错误判断和认识偏差, 使泡沫加剧。

3.3 锚定效应。

人们在形成判断时，通常会从某些可能是擅断的初值开始，然后相对该初值进行调节。但是，实验证据表明，这种调节往往是无效的。换句话说，人们过分“锚定”于初值。这在金融危机中表现为：在资产价格上升过程中，进入市场的投资者的“初值”是“市场健康成长”，这样的“锚定观念”存在之后不利于对于资产泡沫的察觉。

金融危机中从贷款购房者到金融机构都存在对市场持续繁荣的预期，次级按揭户的偿付保障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客户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锚定于这一初值后，便很难觉察繁荣背后隐藏的风险。在房屋市场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而由此衍生的产品可以不断提升价格而产生更高收益。但是，当宏观环境发生变化，通胀显现、利率上升，大量违约客户出现，危机就产生了（左小蕾，2007 年）。

3.4 可得性偏差 (Availability Bias)。

可得性偏差是指在面对不确定结果做出预期时，个体的判断推理过程受可利用的记忆材料的影响，不能从记忆中获得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往往会利用记忆中最容易提取的信息进行主观估计。金融危机中机构投资者易于取得的信息是市场中的流行趋势、流行投资产品、同业对次贷衍生产品的投资行为，信用机构对次贷产品的评级等，而对于经过层层包装与粉饰的次贷衍生品的真实价值和风险状况不易获取，因此容易根据表面信息，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3.5 过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和过度反应 (Overreaction)。

在可得性推断法的影响下，个人对于自己不太能想象的事件会低估其发生的可能性，这可能会造成个人过度自信和过度反应的情况。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能力、知识和未来的预测表现出过分的乐观自信。行为经济学通过实验证明，大多数企业家都存在过度自信问题，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控制风险，认为那些偶发性的事件不值得关注，并低估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从而因过度自信而过度交易。尽管金融高管们大都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仍旧“见利忘险”，其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够聪明，不会拿到风险接力的最后一棒，因而疏于对潜在风险的防范。金融危机中，每个经手信贷违约掉期的人都在寻找下一个买家，认为自己能通过交易，成功的将风险转移，而没有考虑到雪球越滚越大造成的系统风险和无限增加的杠杆。

过度反应是一种市场对信息产生超预期的恐慌或乐观情绪。在金融危机中表现为金融市场的过度恐慌。随着美国利率的提高，次级贷款违约率也大幅提高，并逐渐波及信用卡和优先级市场，市场出现悲观情绪。2007 年 3 月 5 日新世纪金融股价突然暴跌 68.87%，3 天后，新世纪金融宣布贷款银行已拒绝为其提供周转资金，4 月 14 日，新世纪金融申请了破产保护。2007 年 8 月出现了资本市场上的挤兑，未到期的商业票据也都在想办法抛售。2007 年 9 月 14 日英国诺森罗克银行遭储户挤提，两天挤提 15 亿英镑。2008 年 7 月，美国信贷市场爆发了房利美 (Fannie Mae) 与房地美 (Freddie Mac) 危机，标志着美国次贷危可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金融市场过度反映的结果是次贷危机升级，演化为波及世界的金融海啸。

3.6 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是较普遍的一种引起资本市场波动的现象。是指在面临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时，当观察到其他人的决定后，人们往往倾向于跟从其他人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可能与自己的私人信息相违背。在金融市场中表现为：决策主体由于受其他相似决策人的影响而出现趋同的市场行为。决策主体不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而根据社会舆论做出决策，是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矛盾综合，其根源在于决策信息的不足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金融危机中的羊群效应对资产泡沫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市场繁荣期表现为放贷机构非理性的扩大次贷供给的行业冲动；借款者们争先恐后地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从众行为；机构投资者“跟风”

买进或卖出次贷衍生品的过度交易行为等。羊群效应放大市场信号的作用,引起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增加。群体“追涨”的策略,在泡沫形成和持续期间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加速了泡沫的形成。在市场衰退期,羊群效应则表现为:资本市场挤提、套现、银行挤兑等“杀跌”行为,扩大了泡沫破灭时的破坏性影响。

综上所述,在金融危机中,人的心理和行为对整个事件的产生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于“理性经济人”的认识偏差使一些机构产生自利心理,从而引发道德风险,导致资产泡沫产生;“噪声交易”加剧了市场波动性;“锚定效应”导致人们对市场持续繁荣的错误判断;同时由于“可得性偏差”导致“过度自信”和“过度反应”,并产生相互模仿的“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则加速了泡沫的形成,并使次债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4 完善我国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议

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是防范“人因风险”,因此应注重对经济主体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借鉴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建立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虽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程,但至少有以下几点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4.1 改善金融信息的基础设施,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次贷危机和所有的泡沫一样,最初都是人的心理在作怪,而影响人们心理的重要因素是信息。人们的思维过程总是根据可得性信息进行分析加工,从而形成一定的观点。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将使人们产生各种心理偏差,做出错误决策。人们被“噪声交易”迷惑,容易产生“易得性”偏差,而不利信息的传播及人们对于预期的逆转将导致集体非理性“羊群行为”,这些往往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着关键作用。

金融危机中,创新金融工具在投资者和所投资的终端产品之间制造了太多的分离层面,投资者对所投资的资产池中的原始资产信用情况毫不知情,而仅是依靠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来进行投资决策。但当评级报告的信息失真时,系统性的心理和行为偏差便产生了。所以应加强对信息披露及评级机构的监管。同时应改善金融信息基础设施,以使大多数人能够参与金融活动、享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将使社会上大多数群体能享受到更快捷的金融信息、更好的金融建议和更强的消费者保护,也便于经济度量体系的改进,有利于增强人们预期的稳定性,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减少非理性行为。透明、准确的金融信息和决策本身也有助于抑制泡沫的生成。

4.2 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减少系统风险。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将有助于减少由于钟情于“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导致的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决策偏差以及这些偏差可能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的教育和引导,提高其社会责任感,加强监管,运用法律手段,对损人利己、无视社会利益的企业给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加大其违规行为的成本。如果企业的错误行为得不到纠正,反而因违规行为而取得利益,由于“易得性”心理的存在,将导致其他企业纷纷效仿,结果将是社会责任感的整体下降,社会经济风险激增,信用环境恶化,最终诱发系统风险,导致金融危机。

4.3 规范企业风险管理程序。

行为金融学研究还发现,注重程序理性可以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避免一定数量的决策失误。行为经济学家西蒙(Simon)在《管理者行为》一书中将人的理性分为结果理性和程序理性。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们由于无法准确地认识和预测未来,从而无法按照结果理性的方式采取行动,只能依靠某一理性的程序来减少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侧重程序理性,加强对行为过程的考量和控制。

只要程序合理、过程规范，结果理性自是程序理性的必然结果。

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必须从规范风险管理程序入手。首先应以健康的风险文化和理念为前提，树立起贯穿全员和全过程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培育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氛围。其次，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全过程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严密的风险内部控制制度以及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这将有助于减少因个人的“过度自信”、“确认偏差”导致的企业整体利益受损。

4.4 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防范内部风险。

风险大多是来源于人们因逐利心理产生的冒险行为，因此建立科学的利益考评机制或衡量标准——基于风险调整的收益度量机制，将有助于减少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偏差，从而有效防范风险。

目前金融机构衡量盈利水平的传统指标主要包括股权收益率（ROE）和资产回报率（ROA）。这类指标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将风险和收益放在同一时期予以考虑。金融机构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中也没有对收益进行风险调整，不能反映出企业为取得更多收益而额外付出的风险成本，因而不能反映真实的盈利水平。由于资本市场的其他参与者（例如投资者、贷款人，评级机构、监管机构）主要是根据企业报表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因此当报表显示企业前期财务稳定，长期盈利时，他们易被报表数据蒙蔽，而对企业未来经营中即将暴露的风险毫不知情，当企业突然暴露巨额风险损失，陷入危机困境时，他们也将同时陷入窘境。

从企业自身来说，内部激励与分配机制直接影响着管理者的行为，而管理者的行为又将对企业的风险和收益产生影响。如果企业的激励机制是：只按各部门收益水平进行分配奖励而不计其风险成本，则必然激励部门管理者只求利润而忽视风险，从而产生冒险行为，使企业陷于经营风险之中。因此建立一个基于风险调整的收益衡量机制将有助于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由于经过风险调整计算的最终收益水平，将因额外风险成本的增加而降低，因此部门管理者为追求高收益而采取的风险行为未必能获得企业的认可和奖励，从而使其放弃冒险行为，这将降低企业的整体风险水平。如果社会各企业都能采取这一更为合理的收益衡量和激励机制，必将降低市场的整体风险，从而减少系统风险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股东、投资者、定价机构、贷款机构、监管机构都将因此而受益。

作者：曹颖

来源：第七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2010-4-13）

再制造中质量信息割裂的博弈分析



引言

美国波士顿大学Lund Robert T. 教授给再制造的定义为：再制造是将耗损的耐用产品恢复到既能用又经济，经过拆卸分解、清洗检查、整修加工、重新装配、调整测试的全生产过程。Nabil Z. Nasr博士又指出：“一件再制造后的产品能够像一件有商标的新产品一样提供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功能服务和持久性。”从这两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再制造后的产品质量要求应该等同于或高于原制造企业（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 OEM）的产品，我国徐滨

士院士等也多次提出：“再制造必须采用高新技术和产业化生产，确保其产品质量等同或高于原产品。”

再制造企业只有对回收的产品进行持续质量改进(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CQI)，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上才能等同甚至高于原产品。再制造企业的质量信息主要来源于回收后对于产品的质量分析，要对产品进行CQI仅仅对回收后的质量信息进行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还要获得产品回收前各个环节的质量信息，以便制定更为准确的质量标准。从OEM到再制造企业中间经历了产品使用者这一环，所以一部分质量信息间接地被丢失了，如图1。再制造企业如果把积累的质量信息交给OEM，那么OEM可以在二次设计时进行改进，尤其可以针对再制造过程的一些缺陷、不足进行设计改进，从而使OEM产品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反过来，更合理构造可使再制造过程更为便捷，节省制造成本；高质量可便于再制造企业进行CQI，从而提高再制造产品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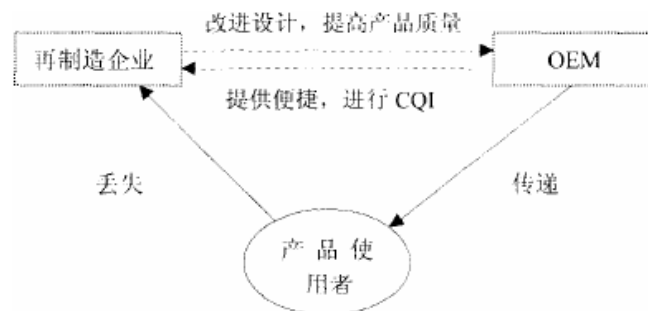


图1 质量信息流动过程

再制造企业在中国目前只有十几家，属于刚刚起步阶段，大部分都是对汽车的零部件进行再制造，而再制造行业运作的模式大部分都属于OEM再制造商模式，即OEM通过经销商和特约维修站来回收旧件，交由OEM进行再制造加工后，再通过售后服务网络进行销售。如上海大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广西玉柴发动机三厂等，都属于此模式。采用此模式OEM企业投资规模大，再制造企业数量少，回收物流半径大。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从全社会的废旧零部件回收再到再制造生产企业，再到再制造产品再销售出去，相当于每件产品从回收点到再制造点之间进行了一次往返，物流成本太高；原材料回收的不确定性影响也无法消除，在传统网络中供应是一个典型的内部变量，其时间、数量、质量是由内部需求决定的，而在再制造物流网络中，供应基本上是一个外部变量，很难预测，具有逆向、流量小、分支多的特点。另外OEM模式下再制造的品种单一，仅限于OEM所属品牌和产品，再制造设备利用率低，成本相对较高，资源利用率也较低。所以此模式适用于行业萌芽阶段，随着再制造在中国的发展，必然出现专业的再制造企业，例如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经过近7年经营，该企业已经形成包括康明斯、斯太尔、大柴6110、朝柴6102、桑塔纳、奥迪、捷达、三菱、切诺基等十几个系列二十多个品种，年生产10000台再制造发动机的经营规模。可以采用的模式为独立再制造商模式、为OEM服务的承包再制造商模式或联合再制造商模式，这三种模式再制造和OEM都是独立的团体，那么质量信息割裂随着再制造在中国的发展必然会产生。

OEM和再制造企业的质量信息由于被产品的使用者间接地割裂了，如果两者直接对质量信息进行交换则双方都可以带来利益。但是在实际中，两种企业都基于自身的短期利益出发，一般选择都不互相提供质量信息。本文重点分析了两种企业从初次开始合作到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动态联盟组织，构建有联盟组织两种企业的博弈模型并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再制造企业和OEM要加强沟通，建立相应的联盟从而带来“共赢”的局面。

1 再制造企业和OEM的博弈分析

1.1 一次静态博弈

为了便于分析，先对复杂的决策环境进行如下假设：

- 1) OEM和再制造企业都有两种行动可供选择，都为{提供质量信息，不提供质量信息}，且两类企业都是有限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经济体，即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
- 2) 参与人在选择战略时，把其他参与人的战略当作给定，不考虑决策对他人决策的影响。
- 3) 市场有关信息是完全的，即二人对相互的特征、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
- 4) 没有联盟组织的参与。
- 5) 二人做出决策之前都不知道对方的行动，可以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即二者之间的博弈是静态博弈。

表1 OEM和再制造企业互相是否提供质量信息博弈模型

再制造企业 \ OEM	提供质量信息	不提供质量信息
	提供质量信息	不提供质量信息
提供质量信息	a, a	b, c
不提供质量信息	c, b	0, 0

基于以上假设可建立如表1所示的博弈模型，OEM选择提供质量信息，当再制造企业选择提供质量信息时，双方收益分别为a和a，当再制造企业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时，双方收益为b和c；OEM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当再制造企业选择提供质量信息时，双方收益为c和b，当再制造企业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时，双方收益均为0。其中 $c > a > 0 > b$ 。

静态博弈过程如下：如果OEM选择提供质量信息时，再制造企业比较收益 $c > a$ ，于是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如果OEM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时，再制造企业比较收益 $0 > b$ ，于是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这样OEM和再制造企业都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两者收益都为0。所以该模型的纳什均衡解为(不提供质量信息，不提供质量信息)。虽然OEM和再制造企业如果都提供质量信息便能获得最佳收益(a, a)，但每个人都害怕单方面不提供质量信息带来损失，因而都会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如果双方都是理性的，那么即便重复N次，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后一次博弈，每个人都有不守信的动机，其理由与一次性博弈时相同，而第N-1次博弈时，双方都知道第N次博弈时对方会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因而这次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仍为上策。如此类推，则整个N次博弈结果都会是(不提供质量信息，不提供质量信息)。这便客观上造成了再制造中质量信息的割裂。

1.2 重复博弈

实际中，两类企业都掌握有自己的私有质量信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过程。假设OEM或再制造企业有一个为非理性的，即动机不是短期机会主义，而是长期合作的收益考虑。由于实际中的信息不对称，两种企业都只知道自己是完全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对于非理性的一方来说，其理性的概率为P，非理性的概率为 $1-P$ 。

一般OEM对于质量信息占有优势，故先假设OEM是非理性的，博弈从 $t=0$ 开始，重复 $t=N$ 次。OEM一开始选择提供质量信息，如果再制造企业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表明再制造企业是理性的，那么从 $t=1$ 以后，OEM将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以惩罚再制造企业，如果是这样，OEM的总收益为b，而再制造企业的总收益为c。如果再制造企业也选择提供质量信息，表明再制造企业也是非理性的，OEM将一直选择提供质量信息直到时期N，如果再制造企业在某个时期 t 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那么OEM在下一次也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加以惩罚再制造企业直到时期N。如果再制造企业是非理性的，那么OEM的总收

益为 $a(N+1)$ ；如果再制造企业是理性的那么 OEM 的总收益最差也只为 b ，这样 OEM 的期望总收益为： $p[a(N+1)] + (1-p)b$ ，此式中无论概率值 p 多么小，总能选择足够大的 N ，使： $p[a(N+1)] + (1-p)b > c$ 这说明对于 OEM 来说，即使他是理性的，在时期 $t=0$ 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也不是最佳选择。换言之，只要时期足够长，双方有足够的耐心，每一方都有选择提供质量信息的愿望和可能。

由上可知，基于长期利益的驱使，双方进入了一个重复博弈的过程，对这个过程有以下几个特征：

- 1) OEM 和再制造企业在首次合作之前并不能完全掌握对方的信息，即双方信息不对称。
- 2) 阶段博弈之间没有“物质上”的联系，也就是说，前一阶段的博弈不改变后一阶段博弈的结构
- 3) 所有参与人都能观测到博弈过去的历史，即信号发送者在某阶段的行动选择不再仅仅依赖于其类型，还依赖于上一阶段信号接收者对其行动的反应行动。
- 4) 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存在多家 $OEM \times I$ 再制造企业。

为方便叙述 OEM 和再制造企业的重复博弈模型，引入以下记号：

- (1) $N = \{1, 2\}$ 为局中人集合，其中 1 代表 OEM，2 代表再制造企业。
- (2) $\theta = \{\alpha, \beta\}$ OEM 提供质量信息水平的类型空间。OEM 提供的质量水平为 α 则表示提供的质量水平为高水平的质量信息，即提供的质量信息包含再制造企业所需质量信息较多。OEM 提供的质量水平为 β 则表示提供的质量水平为低水平的质量信息，即提供的质量信息包含再制造企业所需质量信息较少。
- (3) $m = \{U, NU\}$ 是 OEM 的行动集合即信号空间，其中 U 表示提供质量信息， NU 表示不提供质量信息。
- (4) $a = \{U, NU\}$ 为再制造公司的行动空间， U, NU 表示意思和上面相同。
- (5) OEM 和再制造企业的收益函数分别为 $s(\theta, m, a)$ 和 $T(\theta, m, a)$ 。

首先，初次博弈顺序如下：

第一步，OEM 首先选择自己的类型，OEM 知道 θ 的取值，但再制造企业不知道 θ 的取值，但知道的概率分布为 $P\{\theta = \alpha\} = p$ ， $P\{\theta = \beta\} = 1-p$ 。第二步，OEM 选择发出信号 m 。第三步，再制造企业观测到 OEM 发出的信号后选择行动 a ，初次博弈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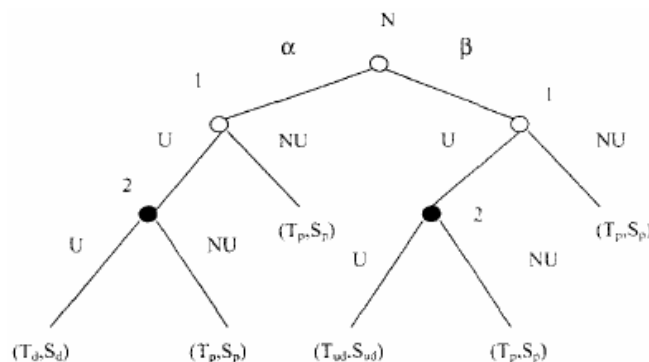


图2 OEM和再制造企业的初次博弈过程

图2中， T 表示再制造企业不提供质量信息给一家 OEM 而提供给另一家 OEM 时的收益， s 表示 OEM 不提供质量信息给其中一家而提供给另一家再制造企业的收益； T 表示 OEM 提供的质量信息为高水平时，再制造企业也提供质量信息时再制造企业的收益， S 表示 OEM 提供的质量信息为高水平时，再制造企业也提供质量信息时 OEM 的收益； T 表示 OEM 提供的质量信息为低水平时，再制造企业也提供质量信息时再制造企业的收益， $S_{\alpha\beta}$ 表示 OEM 提供的质量信息为低水平时，再制造企业也提供质量信息时 OEM

的收益。所以，

再制造企业选择提供质量信息的期望收益为 $p \cdot T_d + (1-p) \cdot T_{ud}$

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的期望收益为 $p \cdot T_p + (1-p) \cdot T_{po}$ 。

当提供质量信息的期望收益大于不提供时，也就是 $p \cdot T_d + (1-p) \cdot T_{ud} > p \cdot T_p + (1-p) \cdot T_{po}$,

即 $p > (T_p - T_{ud}) / (T_d - T_{ud})$ 再制造企业才会选择提供质量信息，因此再制造企业是否合作取决于 P 的大小，即对于 OEM 提供质量水平的高低。在实际中也就是再制造企业对 OEM 提供的质量信息水平估计概率越高再制造企业提供质量信息的机会就越大。

基于以前的经验，双方可选择再次提供或不提供质量信息，即以前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就构成了传递给对方的信号，在对方收到信号后形成后验概率，会修正对方提供质量信息的水平的判断，从而影响以后的行动，这样不断的发出信号和修正判断再发出信号便形成了一个重复博弈过程，即在双方初次博弈第三步再制造企业选择行动 a 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类型空间，在这里设这个空间为 $\theta_1 = \{\alpha, \beta\}$ ， α, β 表示的意义和上面相同，然后 OEM 观察到再制造企业的行动后再选择自己的类型空间 θ_2 ，采取行动，这样形成了一个闭路循环的重复博弈过程。如图 3 所示。

如表 2 可知，再制造企业选择提供质量信息的收益为：

$$A = p a + (1-p) b = (a-b) p + b$$

再制造企业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的收益为：

$$B = p (c - \theta) + 0(1-p) = (c - \theta) p$$

在这个博弈中，虽然再制造企业不制造 OEM 采取什么策略，但却知道如果 OEM 不提供质量信息时受到惩罚的概率和罚款，进而可以估计出 OEM 提供质量信息的概率。再制造企业提供质量信息的收益大于不提供质量信息的时候，即 $(a-b) p + b > (c - \theta) p$ ，也就是 OEM 提供质量信息的概率 $p > -b / (a-b + \theta - c)$ 时，再制造企业会选择提供质量信息，反之则会选择不提供质量信息。而 OEM 提供质量信息的概率 P 与罚金 δ 和受惩罚的概率 θ 相关：当罚金和受处罚的概率的乘积 $\delta \theta$ 越大，那么式子中的分母越大，值越小，OEM 提供质量信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再制造企业由于估计 OEM 提供质量信息的可能性大，其提供质量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我们可以调节惩罚的概率和罚款的多少来控制双方提供质量信息提供的意愿。

通过引入联盟监管机制博弈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使一方不提供质量信息成本大大增加，也使两类企业在博弈中相信其不提供质量信息或提供低水平的质量信息行为会受到惩罚，从而更高地估计另一方会提供质量信息，从而促成互相提供质量信息的局面

2 结论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的分析，基于两类企业长期利益的考虑，每一方都有选择提供质量信息的愿望和可能，从而进入双方重复博弈的过程，然而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意愿和可能拥有一定得风险性，通过引入联盟组织可以减少双方不合作的可能性，从而通过联盟组织把双方以前的历史信息，即提供还是不提供或提供高水平还是低水平作为信号传递给对方，并对不提供质量信息的一方进行处罚，另一方基于长期利益和被处罚的压力从而增大合作的可能。

所以为了形成双方合作的意愿，博弈双方应该传递良好和明确的信息。因此，双方应加强沟通和交流，在接受对方的信息时同时分析它的水平，并良好的把自身的的信息传递给对方。其次，建立相应的联盟的组织，联盟内相关企业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来交流、交换质量信息，并对各成员进行监督，

通过调整惩罚的力度从而促进双方合作的意愿，达到双赢的局面。

作者：吴轲 梁工谦（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西安）

来源：《制造业自动化》2010年第9期

对外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保持着平稳较快地增长。但是，各种不确定因素也在影响着中国的对外贸易。2009 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比 2008 年(下同)下降13.9%，全年贸易顺差1960.7亿美元，减少了34.2%。正如商务部长陈德铭2009 年指出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正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各国彼此针对他国设置的各种贸易和投资壁垒快速增加，贸易摩擦形势更为严峻。因此，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培育出口新优势，提升进口综合效应，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1 实证分析

1.1 货物的外贸规模分析

改革开放30 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更是日益凸显，被喻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一般采用出口依存度来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关数据显示，2001 年至2010 年我国出口依存度总体看来一直处于20%以上的较高水平，2010 年为27.466%，反映出我国经济外向型特征。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拉动作用，但依存度过高增加了我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都会威胁我国的经济产业发展。总之，对外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和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必然导致对外贸易摩擦的加剧，而这些贸易摩擦也会对产业结构造成负面影响。

1.2 服务的外贸规模分析

我国的服务贸易起步晚、基础差，但发展速度较快。近年来，中国在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参见表1。

由表中数据分析可得，从2001 年至2009 年中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8 年时间增长了约4倍。从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数额比较来看，进口数额一直大于出口数额，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01年到2007年先增后减，但2009 年该逆差额再次创出新高，达到41677 百万美元。逆差迅速扩大说明当前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上仍缺乏比较优势。逆差主要来自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等项目，其中，旅游项目自1982 年以来在年度平衡表中首次出现逆差。2009 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我国入境人数较去年明显减少。而支出方面，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因私出境旅游支出不断扩大,2009 年我国出境人数增长4%,进一步加剧我国服务贸易逆差。

1.3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对外贸易结构是一国或地区经济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商品国际竞争力能力、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地位的综合反映。开放对外贸易以来,中国出口商品大多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造成了中国商品大量存在于国际市场,一方面引起国内厂商的恶性竞争,无法体现中国劳动力的正常价值,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倾销的感觉,引发国际经济摩擦。因此改变传统以出口创汇为首要目标的粗放式外贸发展已成为战略问题。

表1 中国2001——2009年服务贸易进出口统计及其在世界的比重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进出口总额	72601	86273	102040	134567	158200	192832	252317	283805	315293
占世界比重(%)	2.368	2.649	2.724	2.995	3.162	3.448	3.811	3.809	3.807
出口额	33334	39745	46734	62434	74404	91999	122206	129507	136808
占世界比重(%)	2.180	2.423	2.471	2.729	2.908	3.197	3.577	3.358	3.139
进口额	39267	46528	55306	72133	83796	100833	130111	154298	178485
占世界比重(%)	2.555	2.879	2.983	3.272	3.428	3.715	4.060	4.292	4.524
差额(出口-进口)	-5933	-6783	-8572	-9699	-9392	-8834	-7905	-24791	-41677
差额占进出口比重(%)	8.17	7.86	8.40	7.21	5.94	4.58	3.13	8.74	14.35

数据来源:根据 UNCTAD database 数据整理计算。

1.4 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分析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集中度比较强,出口比重前六位的行业占到整个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的95%以上,参见表2。

表2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 单位:%

项目	2006		2007		2008		2009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 运输	22.8	34.1	25.63	33.26	26.11	31.67	26.59	28.78
2. 旅游	36.9	24.1	30.47	22.89	27.76	22.75	25.05	26.58
3. 通讯服务	0.8	0.8	0.96	0.83	1.07	0.95	1.18	1.07
4. 建筑服务	3	2	4.4	2.24	7.02	2.75	9.64	2.86
5. 保险服务	0.6	8.8	0.74	8.2	0.94	8.02	1.14	6.82
6. 金融服务	0.2	0.9	0.19	0.43	0.21	0.36	0.23	0.29
7.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3.2	1.7	3.56	1.7	4.25	1.99	4.94	2.02
8. 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0.2	6.6	0.28	6.3	0.39	6.49	0.5	6.68
9. 咨询	8.5	8.3	9.48	8.34	12.33	8.52	15.18	8.6
10. 广告宣传	1.6	0.9	1.56	1.03	1.5	1.22	1.44	1.39
11. 电影音像	0.1	0.1	0.26	0.12	0.28	0.16	0.3	0.2
12. 其他商业服务	21.4	11.2	22.02	14.02	17.68	14.55	13.34	14.21
13. 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	0.6	0.5	0.45	0.66	0.45	0.58	0.45	0.5
合计	100	100	100	100.02	99.99	100.01	99.98	100

数据来源:根据《2009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数据整理计算。

从具体行业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比较多的行业主要是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咨询、建筑

服务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中,旅游业出口比重最大,但近几年有所降低,可能与国际整体的经济环境有关。运输业次之,并且逐年增长,这跟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很大一部分与货物贸易联系在一起有关。咨询、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近几年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中占有的比重逐年增加。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中比重较高的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三个行业增速并不突出。

2 结论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大力推动服务贸易能够对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显著作用,从而可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其机理在于:首先,服务贸易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它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带动中间需求,从而推动其它各个行业组织结构变更和分工的细化。其次,服务贸易作为构成现代产业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其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技术研发、管理咨询、工程设计、金融保险、运输通讯等活动为国家创造价值,提升国家进出口的技术含量。所以,中国应借鉴国际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大力鼓励和支持发展服务贸易。

2.1 致力提升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水平

只有提升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水平才能消除国内垄断,形成更加合理的价格竞争机制,实现对外贸易的持续跨越式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向服务经济进一步转型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也从制造业全球化向服务业全球化升级。所以应当将服务贸易纳入全球视野,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在给国家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所带来的有利因素,在更大范围以更高的效率利用全球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开展跨国界服务贸易经营。

2.2 有效增强服务贸易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新型服务贸易项目

当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在国际市场提高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份额、获取超额利润的主要途径。通过积极利用世界先进技术、高端人才、信息资源,结合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发展技术含量高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工程设计等产业,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2.3 减小服务贸易地区结构不平衡

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服务贸易规模较小。特别在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项目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占有较大份额,中西部地区所占份额较小。要从结构上逐步减少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

2.4 传统服务行业仍需进一步发展

中国服务贸易中传统行业为运输、旅游等贸易依赖型或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也是目前服务贸易进出口的主要行业,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需进一步提升我国旅游产品品质,完善配套设施,加大宣传和推广。同时,通过规范出入境旅游活动,特别是入境旅游的规范管理,提升国外居民来华旅游的质量。

作者:潘有庆(上海明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来源:《经济观察》2011年第8期

美国服务贸易的环境效应

——以出口为例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开始受到人们关注,而国际贸易的环境影响也在此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论题之一。虽然早在1971年GATT就成立了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但期间几经波折,上世纪90年代后该问题才又被列为多边贸易谈判的正式议题。1995年,WTO环境与贸易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人们把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政策等纳入了WTO法律框架内。针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在此之后越发热络,至今俨然成为国际经济学的研究热点。

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时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曾以附件形式关注到服务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但此后的几乎全部文献都把注意力集中于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环境问题很少涉及。不难理解,传统观点普遍认为服务业不像工业那样容易产生“废气、废水、废渣”,服务业还经常被比喻为“无烟工业”。实际上,服务业的范围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服务产品本身的特殊属性也有助于掩盖服务业以间接和更隐蔽的方式对环境造成破坏。例如,早期美国与墨西哥的金枪鱼事件,以及目前由于牙科诊所丢弃权的大量水银废弃物造成的旧金山海湾中水银含量严重超标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一样能够产生不同程度的环境效应(见表1)。

表 1 服务贸易潜在的环境影响

服务业部门	潜在的环境影响
零售、食品分销	运输过程的污染、商品购买的最终处置及对消费者行为的潜在影响
车辆服务与维修	使用与处置有害产品、车辆燃料和油漆的空气污染、燃料泄漏的污染
宾馆、饭店与餐饮服务	食品与包装废弃物、能源与水资源消耗的环境影响
咨询	通过影响客户的行为而对环境产生间接影响
设施建造服务	使用和处置有害产品、再循环的积极影响
干洗	使用和处置有害产品、清洗化学品的空气污染、清洗化学品泄漏的污染
相片冲洗	使用和处置有害产品、废弃物处置的环境影响、胶卷和废弃相机
工程咨询	建造和运营过程中技术选择的一系列环境影响
旅游业	旅游设施的建造和运营对当地环境的直接影响,清洗和维修过程中使用和处置有害产品,水、能源和资源使用的影响,通过影响客户行为的间接环境影响
运输	道路、服务中心等设施的环境影响,车辆运行和维修中使用汽油和有害物质,运输过程的空气污染、噪音和视觉污染
健康与医疗	使用和处置有害物质、药品和生物废弃物、放射性物质等环境影响
环境服务(废弃物和水处理、再循环)	废弃物处理地的土壤、水和空气污染,废弃物和水处理的能源使用,增加再循环和改善废弃物管理等潜在的积极环境效应
金融服务	通过影响客户的行为所产生的间接环境影响
其他服务——娱乐、广告、会计、计算机服务、通讯和公用事业	使用和处置有害物品,能源和资源使用的环境影响,通过影响客户行为的间接环境影响,废弃物处置的环境影响

资料来源:“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s Symposium on Understand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Trade and Environment Presentation by Dale Andrew, OECD Trade Directorate. 转引自曲如晓:《贸易与环境:理论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17页。

本文以当今世界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为例,在其服务贸易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对2002年主要污染物的各服务业部门直接排放系数基于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别计算,横向比较美国服务出口对本国造成的环境影响,以此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美国不同服务业部门进行国际贸易的环境污染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国调整服务业部门结构并优化对外服务贸易地理的若干政策建议。

2 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及其环境影响:与货物贸易的比较

早在完成产业革命进入工业化阶段时期,美国服务业产出占有量GDP的比重就保持在42%-55%,此时工业产出占GDP比重仅从13%上升到42%。二战以后,美国服务业飞速发展,1960-2000年服务业产出比重由58%上升到74%。很明显,在任何时期服务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都大于现代工业而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美国服务业从出生起就已经是一位巨人。当然,正是凭借在服务业上的强大实力,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也长期领先于世界,处于高度发达水平。美国服务贸易总额从1986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初的不到3000亿美元连年增加至2007年的2.5万多亿美元,增长了8倍多(见表2)。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1987-2005年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实那时增长243%,远高于同期货物贸易153%的增幅。另外,如表2所示,根据美国经济分析署(BEA)《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年度报告的分类,分别由外国附属机构和跨境交易实现的服务贸易表现出不同的增长态势。就跨境服务贸易而言,1986年其与货物贸易总额的比率为0.24,2007年这一数字为0.26,基本持平。对于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对应年份这一数字从0.20变为0.55。由此看出,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增长大部分来自外国附属机构实现的服务产品进出口。

表 2 1986 ~ 2007 年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态势 单位:10 亿美元

年份	跨境服务贸易				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总额
	出口	进口	总额	与货物贸易总额的比率 (%)	出口	进口	总额	与货物贸易总额的比率 (%)	
1986	77.5	64.7	142.2	0.24	60.5	57.8	118.3	0.20	260.5
1990	137.2	98.2	235.4	0.27	121.3	109.2	230.5	0.26	465.9
1994	186.7	120.3	307	0.26	159.1	145.4	304.5	0.26	611.5
1998	244.4	165.6	410	0.26	286.1	245.5	531.6	0.33	941.6
2002	279.6	209.0	488.6	0.61	423.5	367.6	791.1	0.99	1279.7
2003	290.2	221.9	512.1	0.26	452.5	374.1	826.6	0.42	1338.7
2004	336.3	258.1	594.4	0.26	642.8	501.5	1144.3	0.50	1738.7
2005	368.5	279.5	648	0.25	725.0	527.1	1252.1	0.49	1900.1
2006	415.3	313.9	729.2	0.25	806.3	615.9	1422.2	0.49	2151.4
2007	480.0	341.1	821.1	0.26	1026.2	678.1	1704.3	0.55	2525.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Jennifer Konz-Bruner and Anne Flatness (2009) “U. S. International Services Cross - Border Trade in 2008 and Services Supplied Through Affiliates in 2007” 数据计算整理。

考察两种形式的服务贸易的环境影响,一方面,外国附属机构的服务交易不涉及服务产品的跨境移动,只要美国居民在美国购买了在美外国公司的服务,通过外国附属机构的服务进口就发生了;只要外国居民购买了在外美公司的服务,通过外国附属机构的美国服务出口就发生了。这时,供给服务产品的服务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所发生的区位不因贸易而改变,尤其是服务出口完全不会对美国本土构成任何污染。另一方面,跨境服务贸易则包含了不同企业或个人的交易以及跨国公司内部不同企业的贸易往来。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服务出口造成的本土污染和服务进口引起的置换污染。不难判断,相比货物贸易,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占率体的美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增长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十分微小(见表3)。

表 3 2002 年美国主要行业污染占总污染比重

	各污染物排放占总污染排放的份额(%)				
	CO	NO ₂	PM10-FIL	SO ₂	VOC
服务业	2.3	0.93	0.77	0.46	3.69
制造业	69.6	19.98	51.56	15.75	74.42
公共事业	21.37	74.06	36.04	82.69	6.86
采掘业	4.89	4.73	8.42	1.01	10.59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环保署“2002 年国家排放物清单”数据整理。CO:一氧化碳;NO₂:二氧化氮;PM10-FIL:可吸入颗粒物,小于 10 微米,可过滤;SO₂:二氧化硫;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根据美国环保署(EPA)发布的“2002 年国家排放清单”(NEI),按标准产业分类(SIC)4 位数作产业拆分,而后通房产值比重加权得到服务业、制造业、公共事业、采掘业 4 种产业造成的 5 种空气污染成物排放状况。很明显,服务业较其他 3 种产业在全部 5 种空气污染物排放方面所占份额均不足 4%,最高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也仅占 3.69%。所以整体来看,美国服务业本身的环境污染水平较低,加之二十余年来其服务贸易增长率要依靠外国附属机构实现,美国对外服务贸易的整体环境效应不十分显著,特别是服务出口对本土的环境污染更是微乎其微。

3 美国服务出口的环境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服务贸易的总体增长态势快于货物贸易,而服务业的总体污染程度低于制造业。接下来,为进一步考察美国服务贸易的具体环境效应,本文借助美国 EPA“贸易与环境评估模型”(TEAM)提供的单位产出污染排放数据,针对 2002 年 12 个主要服务业部门对 8 个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服务出口,分别进行在美国本土 6 种空气污染排放量的统计分析。

3.1 单位产出的空气污染排放

美国 EPA 研制的 TEAM 报告了按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6 位数细分行业的污染排放情况。这里使用的 2002 年 TEAM 给出了 1099 种 NAICS 6 位数细分行业和 1000 种以上不同环境污染排放物的数据。其中,本文选取 12 个代表性服务业部门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空气中残存的有害物 6 种常见空气污染排放作为对象,如表 4 所示。

表 4 2002 年美国各服务业每百万美元产出污染排放量

行业描述	产值(百万美元)	每百万美元产出可造成的污染排放(单位:磅)					
		CO	SO ₂	NO ₂	VOC	PM10	AT
交通运输及仓储	382,152	25,689	2,310	24,517	3,362	1,147	383
信息	891,846	705	16	116	72	7	29
金融与保险	2,803,855	772	71	72	96	25	124
房地产和租赁	335,588	8,339	490	4,739	917	268	212
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	886,801	1,235	67	207	139	782	86
公司和企业管理	107,064	477	49	42	56	12	97
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	432,578	56,165	248	2,314	5,801	688	403
教育服务	30,691	651	57	54	52	9	87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1,207,300	1,171	43	184	166	16	90
艺术与休闲娱乐	141,904	1,206	619	2,145	256	171	138
住宿与餐饮服务	449,499	1,226	72	204	140	32	176
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	307,049	1,684	539	973	5,301	81	964
总计	7,976,326	6,258	265	2,117	864	243	178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环保署“贸易与环境评估模型”(TEAM)数据计算整理。AT:空气中残存的有害物。

容易看出,表中所列服务业生产对美国造成的环境污染中,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以及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业的一氧化碳污染最为严重,其排放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各行业。另外,前者造成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污染相比之下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房地产和租赁业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排放较高,二氧化氮排放仅次于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可吸入颗粒和空气中残存的有害物上,交通运输及仓储业,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业以及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业的平均污染水平很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生产具有显著的高污染密集型特征。相反,诸如占服务业产值比重最高的两个服务业部门——金融与保险业、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业各项空气污染排放都比较低,尤其是美国现代服务业的一些最典型行业——信息产业,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教育服务业和艺术与休闲娱乐业等的空气污染排放更是普遍低下。

3.2 各服务业出口环境效应的国别统计

如前文所述,如果美国某类服务出口增加,这些出口产品的生产在美国当地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增加。循此思路,在表4已知单位产出污染排放量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利用2002年美国不同行业服务出口的国别份额计算这些服务产品在美生产时造成的各类空气污染,间接衡量美国服务出口的不同对象对美国造成的环境影响。假定 x_{ij} 为2002年美对*i*国第*j*种服务出口额, $i=1,2,\dots,8, j=1,2,\dots,12$,得到 8×12 矩阵 X ,则有

$$W = X\otimes S \tag{1}$$

其中,矩阵 S 中的元素 s_j 为当年美国第*j*种服务业产值的倒数。定义 $\otimes$:如果 $A\otimes B=C$, A 是由 a_{ij} 构成的 $m\times n$ 矩阵, B 是由 b_j 构成的 $n\times 1$ 列向量,则 C 中元素 $C_{ij}=a_{ij}\times b_j$ 。由(1)式可得矩阵 W ,元素 w_{ij} 即美国不同行业服务出口的国别份额。以 p_{jr} 表示美国第*j*种服务业第*r*种污染物的单位产出排放量, $r=1,2,\dots,6$,其列向量 $P(r)$ 组成矩阵 P ,则基于美国各行业第*r*种污染物排放的国别统计 $E(r)$ 可表示为

$$E(r) = W\otimes P(r) \tag{2}$$

接下来,由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按国别和产业分类的海外服务销售”以及“其他私人服务”等列表获得2002年美国对其8个率要贸易伙伴服务出口的分行业数据,同时结合表4已知的各服务业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代入上两式求得矩阵 $E(r)$,元素 $e(r)_{ij}$ 为美国对*i*国第*j*种服务出口引致的美国本土第*r*种污染物排放量。由此,2002年美国12个服务行业6种污染物排放的国别统计结果如表5至表10所示。

表 5	2002 年美国各服务业 CO 排放的国别统计							单位:磅
行业描述	加拿大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荷兰	中国
交通运输及仓储	143.72	60.77	117.91	245.56	50.28	55.39	66.35	-
信息	3.27	-	3.77	15.31	-	2.16	-	-
金融与保险	2.38	6.66	1.77	8.24	0.47	0.61	0.34	-
房地产和租赁	38.37	18.34	15.23	70.10	73.40	8.22	21.02	19.88
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	6.58	-	6.19	-	4.98	-	3.19	-
公司和企业管理	0.10	0.02	0.23	1.88	-	0.04	0.03	-
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	200.08	114.00	81.41	398.99	666.72	109.84	69.98	-
教育服务	2.02	2.21	-	-	0.59	0.91	-	2.47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0.04	-	0.01	0.82	-	0.003	0.002	-
艺术与休闲娱乐	1.63	0.83	0.16	5.69	0.24	0.25	0.20	-
住宿与餐饮服务	7.61	0.08	4.49	9.73	2.55	2.81	0.20	-
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	4.60	0.09	1.38	1.57	3.52	1.29	0.63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 BEA 和 EPA 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为数据缺失所致。

表 6 **2002 年美国各服务业 SO₂ 排放的国别统计** 单位:磅

行业描述	加拿大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荷兰	中国
交通运输及仓储	12.92	5.46	10.60	22.08	4.52	4.98	5.97	—
信息	0.07	—	0.09	0.35	—	0.05	—	—
金融与保险	0.22	0.61	0.16	0.76	0.04	0.06	0.03	—
房地产和租赁	2.25	1.08	0.90	4.12	4.31	0.48	1.24	1.17
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	0.36	—	0.34	—	0.27	—	0.17	—
公司和企业管理	0.01	0.00	0.02	0.19	—	0.005	0.003	—
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	0.88	0.50	0.36	1.76	2.94	0.49	0.31	—
教育服务	0.18	0.19	—	—	0.05	0.08	—	2.16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0.001	—	0.0003	0.03	—	0.0001	—	—
艺术与休闲娱乐	0.84	0.43	0.08	2.92	0.12	0.13	0.10	—
住宿与餐饮服务	0.45	0.00	0.26	0.57	0.15	0.17	0.01	—
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	1.47	0.03	0.44	0.50	1.13	0.41	0.20	—

资料来源:同表 5。

表 7 **2002 年美国各服务业 NO₂ 排放的国别统计** 单位:磅

行业描述	加拿大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荷兰	中国
交通运输及仓储	137.16	58.00	112.53	234.36	47.99	52.86	63.32	—
信息	0.54	—	0.62	2.52	—	0.36	—	—
金融与保险	0.22	0.62	0.16	0.77	0.04	0.06	0.03	—
房地产和租赁	21.80	10.42	8.66	39.84	41.71	4.67	11.95	11.30
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	1.10	—	1.04	—	0.83	—	0.54	—
公司和企业管理	0.01	0.00	0.02	0.17	—	0.004	0.002	—
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	8.24	4.70	3.35	16.44	27.47	4.53	2.88	—
教育服务	0.17	0.18	—	—	0.05	0.08	—	2.05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0.01	—	0.001	0.13	—	0.0005	0.0003	—
艺术与休闲娱乐	2.90	1.48	0.29	10.11	0.42	0.44	0.35	—
住宿与餐饮服务	1.27	0.01	0.75	1.62	0.42	0.47	0.03	—
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	2.66	0.05	0.80	0.91	2.03	0.74	0.36	—

资料来源:同表 5。

表 8 **2002 年美国各服务业 VOC 排放的国别统计** 单位:磅

行业描述	加拿大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荷兰	中国
交通运输及仓储	18.81	7.95	15.43	32.14	6.58	7.25	8.68	—
信息	0.33	—	0.38	1.56	—	0.22	—	—
金融与保险	0.30	0.83	0.22	1.02	0.06	0.08	0.04	—
房地产和租赁	4.22	2.02	1.68	7.71	8.07	0.90	2.31	2.19
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	0.74	—	0.70	—	0.56	—	0.36	—
公司和企业管理	0.01	0.002	0.03	0.22	—	0.01	0.003	—
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	20.67	11.77	8.41	41.21	68.86	11.35	7.23	—
教育服务	0.16	0.18	—	—	0.05	0.07	—	1.97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0.01	—	0.001	0.12	—	0.0004	0.0003	—
艺术与休闲娱乐	0.35	0.18	0.03	1.21	0.05	0.05	0.04	—
住宿与餐饮服务	0.87	0.01	0.51	1.11	0.29	0.32	0.02	—
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	14.48	0.28	4.33	4.94	11.07	4.06	1.97	—

资料来源:同表 5。

表 9

2002 年美国各服务业 AT 排放的国别统计

单位:磅

行业描述	加拿大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荷兰	中国
交通运输及仓储	2.14	0.91	1.76	3.66	0.75	0.83	0.99	—
信息	0.13	—	0.15	0.63	—	0.09	—	—
金融与保险	0.38	1.07	0.28	1.32	0.08	0.10	0.05	—
房地产和租赁	0.98	0.47	0.39	1.78	1.87	0.21	0.53	0.51
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	0.46	—	0.43	—	0.35	—	0.22	—
公司和企业管理	0.02	0.004	0.05	0.38	—	0.01	0.01	—
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	1.44	0.82	0.58	2.86	4.78	0.79	0.50	—
教育服务	0.27	0.29	—	—	0.08	0.12	—	3.30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0.003	—	0.0007	0.06	—	0.0002	0.0001	—
艺术与休闲娱乐	0.19	0.10	0.02	0.65	0.03	0.03	0.02	—
住宿与餐饮服务	1.09	0.01	0.64	1.40	0.37	0.40	0.03	—
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	2.63	0.05	0.79	0.90	2.01	0.74	0.36	—

资料来源:同表 5。

表 10

2002 年美国各服务业 PM10 排放的国别统计

单位:磅

行业描述	加拿大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荷兰	中国
交通运输及仓储	6.42	2.71	5.26	10.96	2.25	2.47	2.96	—
信息	0.03	—	0.04	0.15	—	0.02	—	—
金融与保险	0.08	0.22	0.06	0.27	0.02	0.02	0.01	—
房地产和租赁	1.23	0.59	0.49	2.25	2.36	0.26	0.68	0.64
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	4.17	—	3.92	—	3.15	—	2.02	—
公司和企业管理	0.01	0.002	0.03	0.22	—	0.01	0.003	—
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	20.67	11.77	8.41	41.21	68.86	11.35	7.23	—
教育服务	0.16	0.18	—	—	0.05	0.07	—	1.97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0.01	—	0.001	0.12	—	0.0004	0.0003	—
艺术与休闲娱乐	0.35	0.18	0.03	1.21	0.05	0.05	0.04	—
住宿与餐饮服务	0.87	0.01	0.51	1.11	0.29	0.32	0.02	—
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	14.48	0.28	4.33	4.94	11.07	4.06	1.97	—

资料来源:同表 5。

和前述行业整体污染状况基本一致,有数据显示的国家从美国服务进口导致在美国服务业生产的 CO 污染以交通运输及仓储业,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业为最,其次是房地产和租赁业。其中,美国交通运输及仓储服务对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出口引起的污染排放较多,依次为 245.56、143.72 和 117.91 磅;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对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出口引致 CO 污染程度较强,依次为 666.72、398.99 和 200.08 磅。美国多个现代服务业部门对英国、日本和加拿大服务出口的 CO 排放量相对稍高,例如信息业、金融与保险业、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公司和企业管理服务业、艺术与休闲娱乐业等。对比之下,公司和企业管理服务以及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服务在 12 个行业中平均 CO 排放量最低。由于有关中国的数据统计缺失,有数据显示的只有房地产和租赁服务以及教育服务,横向比较可知,我国进口美国教育服务对美国 CO 排放的影响处于较高水平,为 24.71 磅。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的与制造业有关的服务出口还是现代服务贸易,英国、加拿大等服务业发达国家充当了美国服务业 CO 排放的主要来源地。

与 CO 同样来自石油、煤等化石燃料的 SO₂ 和 NO₂, 服务业整体污染排放水平比较低。和工业企业关系密切的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对所有国家服务出口导致的两种污染排放量都很高,其次是房地产和租赁业以及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业。这些行业中,英国、法国和加拿大是进口美国服务造成美国 SO₂ 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英国和加拿大也是进口美国服务造成美国 NO₂ 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横向比较,美国出口日本的金融与保险服务业中 SO₂ 和 NO₂ 排放量都较高,分别达到 0.61 磅和 0.62 磅。现代服务业方面,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和艺术与休闲娱乐业的两种污染物平均污染程度均略高于其他行业,同时加拿大和英国是其中表现突出的两个国家。在 8 个国家中,中国进口美国教育服务数额最大,所

以美国教育服务业的出口污染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与以上三种服务业污染排放相较,化学品燃烧废气和可燃有机物蒸汽等带来的VOC排放量较低,AT污染则更低。美国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交通运输及仓储以及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出口造成的美国国内VOC和AT平均污染水平相对较高。其中,依然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为进口美国服务造成美国两种污染排放最严重的地区。在VOC方面,美国对所有国家的公司和企业管理服务与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服务出口污染程度最小,平均不足0.01磅。其他现代服务业部门,如信息业、金融与保险业和艺术与休闲娱乐业等污染排放也普遍很小,基本维持在0.6磅左右。而在AT方面,除各行业污染均值较低外,法国在房地产和租赁业与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业上成为美国出口污染的主要来源地,加拿大则在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上污染稍高。

PM10是由尾气工厂废气等产生的长期漂浮于空气中小于10微米的颗粒态污染物,其随呼吸系统进入人体肺脏并通过血液循环输往全身,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控制PM10排放量是各国政府环保政策的重中之重,当然也是衡量一国环境质量的率要指标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在PM10平均污染最高的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业方面是美国服务出口环境效应较显著的三个国家,污染排放量依次为68.86磅、41.21磅和20.67磅。加拿大和法国在除公共管理外的其他服务上对美国进口引致的污染最大,分别为14.48磅和11.07磅。美国交通运输及仓储服务对英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出口造成的PM10污染较前几种污染物稍低,且几乎平均分布在除英国外的其他各国。对于大多数现代服务业,PM10排放量普遍很小,但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与房地产和租赁业相对例外,其出口污染稍高于信息业、金融与保险业、公司和企业管理服务业、艺术与休闲娱乐业等。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总体而言,由于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增长主要依靠美国外国附属机构实现的非跨境式服务产品交易,而服务业本身较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环境污染程度较轻,服务出口间接对美国本土造成的污染排放整体上保持低水平。具体而言,在以上考察的2002年美国12个服务业部门6种污染物排放中,与制造业相关的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以及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业的污染密集度很高,房地产和租赁业紧随其后。占服务业产值比重最高的金融与保险业、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业的各项空气污染排放都较低,而现代服务业部门中的信息业,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教育服务业和艺术与休闲娱乐业等的空气污染排放更是普遍低下。所有服务业部门的一氧化碳排放居各污染物之首,其排放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污染物。二氧化氮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仅次于一氧化碳,前者在交通运输及仓储服务业上污染严重,后者的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业上表现突出。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和空气中残存的有害物排放整体上相对较少,特别对于现代服务业部门该特征更加明显。从美国服务出口的国别视角审视美国本土服务业环境污染的对外地理分布,英国和加拿大是相对重污染服务业部门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地区,法国和德国其次。现代服务业方面,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进口的美国服务产品在美国生产的平均污染水平较高,其中以英国和加拿大最高。

因此,为了合理引导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在此基础上把握当前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国别结构决定的各服务行业污染状况,进一步通过调整服务业发展格局、优化服务贸易地理以逐步减少美国服务业整体污染排放、缩小各服务行业环境污染差异以及降低服务贸易对环境可能管路成的不利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强化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稳定跨境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服务业对外直接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服务业FDI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5%。但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已达40%,绝对额突破3000亿美元。此后,无论世界经济风云变幻,服务业的全球扩张一直呈现强劲势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服务业跨国公司无论是海外子公司资产比重还是销售额比重,整体都处于迅速增长态势。其中,交通运输、通讯和公共事业等海外子公司资产和销售额比重年均增幅超过60%。

毫无疑问,美国服务业企业的国际扩张速度已领先于世界,强化和巩固全球竞争优势不仅对于持续提升美国服务业FDI发展水平至关重要,而且由于服务业跨国公司实现的服务贸易对本土的污染几近于零,其对于控制服务贸易的整体环境效应也同样意义重大。

其二,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加速传统服务业产出模式的转型升级。自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美国就稳居全球服务业发展的中心地位。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已经从制造业完全转移至服务业,美国服务业正在向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在此条件下的信息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部门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主导产业。随着现代服务业的纵深发展,其与美国先进制造业的全面融合加速了新技术、新组织形式和新的生产模式在传统服务业中的应用,有助于实现资源更加高效的配置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从而利用各行业污染差异降低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其三,调整对英国、加拿大等的服务品出口结构,削减各类污染排放总量。一直以来,美国主要的对外服务贸易伙伴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美国服务产品的主要进口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等的交通运输及仓储服务,行政支援、废物管理和救助服务进口不仅占其自身服务总进口的绝大比重,同时其也是美国该类服务出口的主要目的国。这些与制造业有关的传统服务业正是一氧化碳等主要污染物密集排放的典型行业,而诸如信息服务业,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部门的环境污染则相对较小。目前,虽然发达国家在吸纳美国现代服务业出口方面已经作出极大贡献,但就服务贸易商品结构比重来看仍有不小提升空间,且从服务贸易整体污染状况的长远角度考虑,政府应尽力引导主要服务进口国加大现代服务业贸易密度,逐步缩减传统服务业的贸易份额。

其四,平衡服务出口的地区分布,有效协调和控制服务贸易总体环境效应。由于发达国家大都具有相似的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等特征,它们之间容易形成同类产品的相互出口和进口,服务也不例外。在美国服务出口的目标市场中,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日本瓜分了美国服务贸易总额的近60%。服务出口地区分布的过分集中不利于协调各类服务品的贸易导向,若进口国又在传统和现代服务品的贸易上严重失衡,必将增加服务贸易总体环境效应的控制难度。所以应对此提高重视,在调整服务业部门结构和贸易品结构的基础上适时优化服务出口的国别结构,以便将服务贸易污染限制在预定范围内,从而顺利实现政府的环境政策目标。

作者: 蔡宏波 曲如晓(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2 月单月贸易逆差达罕见的 314.9 亿美元

逆差不会持续 全年仍将顺差(经济聚焦)



2 月贸易逆差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和国内经济运行良好、企业信心提升、积极扩大进口补充库存有关,和近几年政府积极促进贸易平衡也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季节性因素。

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加大了外贸企业经营压力,导致部分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强的产品订单向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且

这种趋势在增强。

3 月 15 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就近期外贸、消费、对外投资等领域出现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顺差会逐步减少,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望进一步下降

今年 2 月, 我国进出口总值实现 2604.3 亿美元, 增长 29.4%。其中出口 1144.7 亿美元, 进口 1459.6 亿美元, 单月贸易逆差达 314.9 亿美元。

“2 月贸易逆差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导致的, 和国内经济运行良好、企业信心提升、积极扩大进口补充库存有关, 和近几年政府积极促进贸易平衡也有关, 但最主要的还是季节性因素。”沈丹阳说, 从历年经验来看, 我国外贸在春节前后往往呈现“节前赶出口, 节后赶进口”的特征。春节后一段时间, 进口到货比较集中。加上去年 2 月份受春节长假影响, 进口基数偏低, 所以直观来看, 今年 2 月进口增速比较高。

沈丹阳表示, 估计贸易逆差情况不太可能持续下去。总体看来, 今年全年仍将是贸易顺差, 但顺差会逐步减少,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望进一步下降, 进出口贸易会进一步趋于平衡。下一步, 商务部将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 保持对外贸易基本稳定, 力争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

中方原材料出口管理的政策目标符合世贸规则

3 月 13 日, 中国在日内瓦收到美国、欧盟、日本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的有关稀土、钨、钼出口管理措施的磋商请求。“磋商应该很快就会开始。”沈丹阳表示, 中方对原材料出口管理的政策目标是正当的, 主要目的是保护资源、保护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方无意限制贸易自由, 更无意通过扭曲贸易的方式保护国内产业, 我们的政策目标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并完善对“两高一资”产品的综合管理, 这既是中国自身科学发展的需要, 也是对保持全球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努力。

“不仅如此, 中国政府对有关原材料产品的出口与国内开采、生产, 实施了同步管理。在统筹考虑国内外市场情况、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后, 合理确定年度出口量, 基本满足国际市场正常需求。这体现了中方是负责任的世贸组织成员。”沈丹阳说, 对美欧日提出的磋商请求, 我们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妥善处理。

外贸企业应主动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 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针对外贸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 沈丹阳说: “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为外贸企业非常关心、非常着急的一个问题。对此, 要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分析。”

从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民生的角度看, 工人工资收入提高当然是好事, 是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的成果体现, 更是中国外贸对国民福利增加的贡献。适度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促使企业改善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加快转型升级。劳动力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这为加快外贸结构调整带来新动力。

但是, 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更多还是一种挑战。2011 年以来, 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 25 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 22%, 相应的企业用工成本也会上升, 外贸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幅度更大。“这在客观上加大了外贸企业经营压力, 特别是给一些小微企业带来较大困难, 导致部分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强的产品订单向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而且这种趋势在增强。”沈丹阳

说。

沈丹阳表示,希望外贸企业主动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加快结构调整步伐,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研发、设计、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创造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商务主管部门对大多数对外投资的管理,实质上已经接近备案管理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97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6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74.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1%。

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据商务部统计,非国有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占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的比重逐年上升。去年,非国有企业占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约 44.4%。沈丹阳说,商务部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投资便利化,简化审批手续,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方便。比如,2009 年颁布实施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仅保留对少数类别对外投资的核准,绝大部分类别是放开的,不需要核准。“从申请材料、审核重点、办理时限来看,商务主管部门对大多数对外投资的管理,实质上已经接近备案管理。”沈丹阳说。

针对近年来在网络零售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沈丹阳表示,虽然网络零售领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基本状况可控。目前,第三方支付和网络零售的商品品质基本可以得到保证。商务部对网络零售领域的电子商务仍然以鼓励发展为主,一直把网络零售作为商业领域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形态。“网络购物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商业零售业不够发达、不够完善。”沈丹阳说,我们首先要看到网络零售发展的主流,肯定它的作用,促进它的发展。同时,一定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通过完善第三方支付等方式保证资金安全,同时还要打击假冒伪劣、保证商品品质。

来源:《人民日报》(2012-3-16)

利用本土市场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组织形态和竞争手段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但如何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顺利地衍生、成长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支柱,还需深入探讨。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过程中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中存在的创新惰性和附加值低、高能耗等顽症,事实上已经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障碍。

同时,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外资企业在华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带动了我国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但也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市场换技术”的成效需进一步延伸。以获得市场份额为目标的跨国公司为保持技术强势,通常来说,转移核心技术的动力并不强,占领市场后也会有意识地利用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等对合资企业加以控制。此外,外资企业利用优厚待遇吸引大批国内科技人才导致人才流失,进一步增强了本土企业对外方先进技术的依赖。

如何推动现有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使之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还需充分利用我国市场的特殊性,在突破“微笑曲线”枷锁的进程中,一步步获取新兴产业的比较优势。

我国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特别是低端市场和农村市场,存在大量的市场潜在需求者,具备培育和发展颠覆性创新的土壤条件。例如,比亚迪、中集、华为、爱国者、天宇朗通等企业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的优势和颠覆性创新的规律实现跨越式发展。国外企业如西门子、GE 等也纷纷将中国市场作为其全球创新业务的重要培育基地。西门子中国从 2006 年起自上而下推行一个名为“SMART”(聪明)的战略计划,目的是设计出一批符合 S.M.A.R.T.(即简单易用、维护方便、价格适当、可靠耐用和及时上市)理念的产品。GE 于 2009 年宣布未来 6 年里将投资 30 亿美元开发至少 100 个成本更低、使用更方便、质量也更好的医疗保健新产品。其中,价值 1000 美元的手持式心电图设备,虽然最初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开发的,但在技术成熟后同样投放美国市场并成为畅销产品。可见,本土市场可以为企业技术和产业创新提供机遇,且这些创新成果可以在出口市场中获利。中国台湾长期受制于“微笑曲线”理论,是因为岛内市场狭小,限制了其从曲线两端获取高端价值的能力。而中国内地本身具有广袤的国内市场,有可能充分利用本国市场达成规模经济,迅速壮大产业规模,从而突破“微笑曲线”的束缚。

作者: 郝凤霞

来源:《解放日报》(2012-3-13)

温州金融改革再出发

——对温州金融风波的认识及推进改革思路

金融快讯



2011 年的 8 月到 9 月,温州民间金融生态遭遇到了一场生存危机,一些企业出现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情况,有些企业主因承受不了压力,选择出逃躲避,有几位企业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温州民间金融信用体系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始终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也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寻求救治之策。从中央到浙江省,都非常关注温州遇到的这次危机,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国庆期间亲临温州考察,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经过了这场风波,我们更加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温州曾经是改革先锋,在全国民间金融发展形势都不很令人乐观的环境下,我们希望再次扛起改革的大旗,先行先试,为温州,也为全国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实践经验。目前,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期待在不久之后,我们的改革能进入实施阶段。

1 温州民间金融的核心特征是信用精神

温州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典型和代表,对市场力量有更深切的感受。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给予

老百姓创造财富的制度空间，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在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发展经验被称作“温州模式”。

一般认为，“温州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是政府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其特点是家庭工业的兴盛、市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温州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深奥的地方，我认为，“温州模式”关键是让企业家精神、市场力量充分发育并发挥作用。在温州 786 万户籍人口中，现在有 175 万在全国各地创业，有 60 万在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温州本土有 40 万个市场经济主体，差不多每 3 个温州人中就有 1 个自己创业。温州人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做老板，其奋斗精神令人敬佩。

温州人有“三板”精神：“当老板，睡地板，看黑板”。温州企业家精神、市场力量促进了温州的发展，同时，温州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助推了全国的发展。

170 多万温州人到全国各地所传播的温州文化、传播的市场经济精神，应该说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得到广泛赞扬与认同；温州人对推动全球化，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温州民间金融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人在改革开放初期，闯荡天下、创办家庭工厂初期，并没有原始积累，就是靠亲戚朋友集资入股，举办经济实体，形成了今天的温州人网络、温州产业集群。这种民间金融的基础就是民间信用。但是，这种信用是建立在人缘、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信用，基础薄弱，一旦外围宏观形势发生变化，这种信用体系禁不起冲击，甚至发生变异。所以，民间金融市场潜藏着一定的风险，而且在有些时候是残酷的。

在 2011 年 8 月到 9 月，温州发生了局部金融风波。之所以说是局部金融风波，是因为全市工商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共 42 万多家，而问题企业仅 90 多家。这些问题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迫于各方压力，有些企业家跳楼自杀。由于这些极端事件的发生，外界对“温州模式”、温州民间金融的质疑之声随之响起。这场金融风波，固然有温州自身的原因，但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特别是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场金融风波折射和反映出来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如虚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失血”、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温州人头上。

民间金融与高利贷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把温州在合理范围内的民间借贷等同于高利贷，认为民间融资方式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把民间金融跟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对立起来，甚至妖魔化民间金融，是对“温州模式”、民间金融的误读，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妖魔化温州，不利于温州经济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应该说，温州企业家的信用精神是非常好的。出现跳楼、自杀，这诚然是不幸的，却恰恰反映了温州企业家是何等重视信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温州的企业家用他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他的信用，他已经把命搭上去，我们还能去指责他什么呢？这种方式固然不可取，但是，我认为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开拓市场的精神。

2 化解金融风波取得初步成效

温州出现的局部经济金融问题，引起中央高度关注。2011 年 10 月 4 日，温家宝总理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来温州考察调研。调研中，温总理强调，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支持专为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同时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就是因为民营企业有需求，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正门开得不大，那旁门就

要开；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

温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温总理“一个月内稳定经济金融形势”的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指示，市委、市政府本着标本兼治、长短结合的原则，切实加强组织协调，相继出台了《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大企业服务力度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做好民间金融风险 and 倒闭企业的应对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全力以赴化解局部经济金融风波。期间，我们组织开展了企业资金链风险和银行信贷风险的大排查，严厉打击暴力讨债、非法拘禁、哄抢企业财物、堵塞交通等违法犯罪行为；落实好国家有关提高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开展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政府“企业服务百日克难”行动，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全市 25 家银行业机构纷纷出台扶持方案，出手救急温州中小企业。在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指导、扶持下，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等积极组织抱团自救，齐心协力共渡难关。通过各方不懈努力，温州民间借贷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基本得到控制，未再出现较大的企业倒闭或者企业主出走情况，未发生大规模聚众围堵、讨薪、群体信访、个人极端事件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全市经济金融运行和社会形势总体趋于平稳。

温州化解局部经济金融风波初步取得成效，但是，从深层次上讲，温州地方金融体系二元结构中的“两多两难”，即“民间资金多而投资难、小微企业多而融资难”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经济和金融运行压力依然存在。

3 金融综合改革的思路与目标

任何单独的个人、企业家都应该与整体经济社会环境实现良性互动。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需要温州企业家不断提升自己、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温州也要坚持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积极推进金融综合改革，并把金融发展作为战略性方向。

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温州正在争创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着力构建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使金融成为推动温州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强大动力。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努力打造地方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民间金融规范发展先行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示范区、民间资本集聚的“资本之都”。

我们的总体任务是加强“四个体系”建设：

——完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建立面向小微企业的专营机构，加快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推进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推动地方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强、做大，鼓励适当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规范融资性中介机构，逐步形成多层次、广覆盖，互为补充、良性竞争的金融组织体系。

——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全面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展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组建温州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服务平台，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创新发展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以适应经济发展对金融的需求。

——健全民间资本市场体系。推动股权投资机构集聚和设立，推进企业上市，开展温州区域性产权（资产）交易市场试点，有步骤地发展温州债券市场，完善资本与项目、借方与贷方的对接平台，促成中小企业股权交易、新型金融组织资产交易，改善民间资本的有序流动，拓宽投资渠道。

——强化地方金融监管体系。设立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防范和

控制金融风险。

温州在当前申报、推进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基础上，要立足长远，本着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更大力度地推进金融改革：一是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民间金融机构，取消计划审批制，实行登记备案制；二是放宽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发起人的资格限制，向合格的自然人投资者开放；三是在温州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开展利率市场化改革试点；四是在温州试点建立 OTC（场外交易市场或柜台交易市场）。

根据我们当前的构想，到 2013 年，温州将建立 100 余家注册资本总额达 800 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届时，大银行与贷款公司的分工将更加明确、合理，即大银行从事资金批发，贷款公司专门从事资金零售，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服务小微企业。到“十二五”末，温州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 15%，金融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要达到 8%。

推进金融综合改革，是温州整个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委、市政府将统一协调，把金融工作纳入各县（市、区）和有关部门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间力量的作用，调动海内外温州人特别是温商群体的积极性，吸引海内外温商回归发展金融业，参与地方金融体制改革，使温商成为温州金融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要把环境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全面优化信用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和人才环境，切实为金融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以勇于改革著称，金融领域的改革曾经走在全国前列。当前，温州又迎来了地方金融改革创新的历史性机遇，我们相信，温州一定能够解放思想、抢抓机遇，锐意改革、再创优势，努力开创金融业发展新局面，为加快经济转型、为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新的探索和实践。（作者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温州市委书记）

作者：陈德荣

来源：财新网（2012-2-27）

房价调控将如何收场？

最新一轮房价调控又已逼近摊牌时刻。房价调控会再次成为“空调”吗？

中国房价调控肇始于 2005 年，其持续时间之长、政策之密集、效果不尽如人意，令人侧目。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房价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政府最初的调控聚焦于购房需求，采取了提高首付比例、房贷利率上浮等措施，继而又试点推出房产税，甚至祭出了备受争议的限购令。然而这些政策成效甚微。

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中国宽松的货币供给，导致了长期的实际负利率，催生了居民理财需求。其次，本应成为理财主渠道的股市，却因为上市公司质量差强人意和浓厚的投机气氛，让大量投资者望而却步。而买房则进入了越买越涨、越涨越买的上升循环。第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势不可挡，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都将继续成为房价推动力。第四，结婚买房的强大习俗，以及男方女方不惜整合全家资源买房的决心，构成了巨大的刚性需求。第五，中国有庞大的灰色收入，对这些灰色收入而言，买房成了既省心又安全的理想去处。更重要的是，灰色收入对金融调控高度不敏感，只对反腐敏感。现在哪个贪官不是“房多多”？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研究，2008 年灰色收入

即高达 5.4 万亿。

因此，虽然政府从需求角度出台了密集的打压政策，购房需求依然足够强大。

真正触动房价的，是房产供给方的变化。在 2008~2010 年经济刺激过后，货币投放出现失控，导致 2011 年通货膨胀明显成为头号威胁，中央被迫采取金融紧缩政策。遗憾的是，央行采取了“加息为辅、提高准备金率为主”的政策，两年内 12 次提高准备金率，结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飙升至 20% 以上的历史高位。这一政策，直接导致银行体系流动性陷入困境。作为条件反射，银行开始削减对中小企业和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投放，于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大批中小企业陷入资金困境。

把房地产开发商逼入绝境的是房地产成交量的急剧萎缩。由于浓厚的观望情绪，房地产成交量严重下滑，这使得房地产商大量资金沉淀在待售楼盘上。对资金密集的房地产行业而言，一方面没有贷款，一方面房子销售停滞，最终部分房地产商被迫降价卖楼，房价终于开始松动。

但是，切莫以为房价调控即将大功告成。相反，现在的房价调控不仅不可持续，一旦放松之后房价反弹在所难免。

第一，房地产调控的僵局，最先冲击到的是地方政府。2011 年下半年以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下降，不少地块甚至出现流拍。芜湖市对购买新建自住房屋的市民给予购房补贴和税收减免的政策，虽然被中央喊停，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地方政府已不堪承受关键收入来源冻结的重压。由于土地出让金对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贡献达到一半左右，土地市场冻结的冲击可想而知。地方政府在收入锐减的同时，却要面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到期压力。超过 10 万亿的地方平台项目融资，有不少都有赖于卖地收入偿还。要么银行同意延长还款期限，要么地方政府就会出现债务危机，要么放松房价调控。因此，中央现在面临如下的复杂局面：地方平台融资还款倒逼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倒逼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倒逼房价调控政策。

第二，从房地产商角度看，房价调控僵局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大量项目停工或取消，一是部分房地产商倒闭，甚至连绿城这样的大型地产公司也面临“生死时速”。问题在于，房地产商是房产的生产者、供给方，他们目前的困境意味着未来几年新上市房源供给的下降，这将为房价报复性反弹埋下伏笔。

第三，购房需求并未消失，他们只是在观望。一旦市场出现转折信号，需求又会重新爆发。面对新楼盘的减少，重新爆发的需求势必导致房价快速反弹。

由于房地产、地方政府投资和高铁投资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强大驱动力，现在这三个发动机同时熄火，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迅速放大。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动荡以及 2012 年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权力交接，都决定了政府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容忍经济来一次硬着陆。

逆转的信号已经出现。央行连续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这使得那些快被“冻僵”的房地产商重新复苏。在最近的一次降低准备金率后，泛海建设、银基发展、深物业 A 和中粮地产等不少地产股出现涨停。市场已经嗅到了转折点的到来。

虽然中央依然坚称房价调控不动摇，但我们应该相信的是经济规律而非中央的表态。在确保经济不会硬着陆与房价调控之间做选择的话，中央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

接下来的局面不难预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继续下行，房地产商重获“源头活水”；地方政府采取更加隐蔽的做法悄悄放松对房地产的限制；中央虽然口头上继续坚持调控，但实际上将对房地产业无法继续那么严厉；随着信号扭转，大量买房者停止观望，房价重拾升势不可避免。

房价调控将再次沦为“空调”。一项政策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它的初衷，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遵循

了经济规律。

当然，房价调控并非无解。中国所谓的房价泡沫，其实源于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化解房价危局，必须从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控制地方政府开支，减少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推广房产税，加大持有多套房的成本；严厉打击腐败，将没收的房产进行拍卖；破除垄断、降低税负，增加普通公众实际购买能力；开征遗产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但是对不起，没有速效药。

作者：刘胜军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12-2-28）

金融货币长周期将在哪里出现拐点

人口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变迁，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周期以及货币金融的长周期，体现在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放缓、储蓄率逐步下降、贸易顺差收窄以及货币金融环境与资产估值的变化等。这些将给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带来全方位的影响。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仿佛在享受一场货币金融盛筵：储蓄率的攀升支持投资高速增长，大量年轻劳动者从农村涌向城市，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抑制了物价；经济高速增长吸引外资流入，贸易盈余推动外汇储备攀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增速显著提高，一些风险资产的估值大幅提升。然而盛筵是否有尽时？如果有，趋势的转折受什么驱动？对风险资产有什么影响？

1 盛筵开始：超越货币政策的解释

如果说早期的货币高速增长主要反映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功能的体现，2003 年以来宽松的货币环境则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城镇化所导致的高储蓄率紧密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讲，我国的生产者或储蓄者（25-64 岁之间）与消费者（24 岁以下和 65 岁以上）人数比例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不足 100%快速上升至目前的 125%。与此同时，在城镇化的带动下，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镇大量转移，不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实际有效的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比率比年龄结构变动所显示的上升得更快。产出减去消费就是储蓄，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我国的储蓄率从 1990 年代的 35% 上升到目前的 50%左右。

储蓄率的升高从三个渠道助推了货币的扩张。

第一，高储蓄率意味着较快的资产或财富积累，而财富的快速增长也要求流动性资产的较快增长，货币则是流动性资产的主要形式。

第二，生产者大幅超过消费者，储蓄率上升意味着我国经济从短缺型过渡到过剩型，物价上升对货币扩张的弹性系数下降。1986-1995 年我国的平均 CPI 通胀高达 11.9%，而 1996 年以来平均为 2.3%。较低的通胀压力提高了政策对货币增长的容忍度，导致货币政策易松难紧。

第三，储蓄率提高的另一个结果是贸易顺差的扩大，在强制结售汇和资本账户管制的体制下，形成了外汇占款推动货币扩张这一较为独特的货币现象。2003 年以前我国货币增长的主要方式是传统的新增贷款，政策对货币增长的调控能力相对较强。但从 2003 年起，外汇占款增量开始迅速上升，

2003-2010 年外汇占款增量占 M2 增量的平均比重达到 43%。由于外汇占款取决于贸易顺差和资本净流入，对央行来说是外生因素，相当于被动的货币投放，政策紧缩对货币环境的调控能力从而有所减弱。

2 货币高速增长的外延

储蓄率上升推动货币增速加快，这个过程的影响不局限于流动性资产，还波及风险资产和整个金融环境，包括非银行部门的风险偏好、外汇资产的分布，以及影子银行体系，而这一切相互影响，反过来对宽松的货币环境推波助澜。

首先，非银行部门对风险偏好的增加助推资产泡沫。居民和企业持有的广义流动性的快速增长，刺激其风险偏好，导致非银行部门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这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风险资产估值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其次，外汇资产分布不平衡。与央行外汇占款(外汇资产)增加相对应，私人部门外汇资产配置严重不足。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对外净资产约 2 万亿美元，但央行持有 3.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私人部门则对外净负债 1.2 万亿美元。外汇资产在政府与私人部门间的不平衡分布一方面是因为政府要求强制结售汇，另一方面是私人部门基于对人民币风险资产估值上升的预期，愿意将外汇与政府兑换。

第三，影子银行体系的快速扩张对货币宽松推波助澜。2003 年以来，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和银行的信贷冲动导致政策当局对银行信贷能力加大限制。表内业务吃不饱，银行就要拓展表外业务，由此导致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快速发展，包括银行理财产品的快速增长。

诚然，受政策限制较少的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对利率市场化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影子银行创造的诸多新形式的流动性并未纳入 M2 的统计中，这无疑加大了货币当局对广义流动性规模的衡量难度，也对货币政策的执行和金融风险的控制都构成了挑战。

3 盛筵难再：货币增长终将放缓

对中国货币长周期上半场的剖析，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长周期的下半场——未来会怎样？我们的理解是，驱动上半场盛筵的各种因素——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增长与储蓄率——都在发生变化。

从人口红利来看，中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例将在 3—5 年内出现拐点，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大幅减少，未来可转移的空间已经很小，拐点可能来得更早；从制度红利来看，加入 WTO 带来的效率红利在消失。这两者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周期与货币金融周期将进入下半场。

有几点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潜在增长率的放缓降低了央行对货币高速增长的容忍度，货币政策将趋向更谨慎。

其次，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甚至绝对水平下降，意味着央行对基础货币投放的调控能力增强，减少了通过法定存准率、行政性措施(如存贷比)、数量型工具(如贷款规模)来限制银行贷款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不仅法定存准率将面临趋势性下降，货币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贷存比的 75%上限规定也将最终得到监管机构的重新界定。

在此过程中，上半场累积的外汇资产在政府与私人部门间的不平衡分布将得到更正——央行于 2007 年不再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这为私人部门增加外汇资产配置提供了条件，在潜在增长率放缓和人民币升值空间缩小的情况下，私人部门配置外汇资产的动机将会逐步加强。

还有风险资产去泡沫化。货币增速结构性的放缓意味着流动性资产增速放缓，而这将导致风险偏

好降低和风险资产估值下降。过去十年泡沫化程度较高的风险资产，尤其是房地产，在未来长期内面临估值下降和去泡沫化的压力。

4 货币长周期对短期政策的影响

我们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跨度里面描述了中国货币金融的周期，总结一点就是，和过去高速增长比较，未来的货币增长将有显著的放缓，这个过程将伴随风险资产——特别是在长周期上半场被充沛资金过度追逐的资产，比如房地产——的估值水平下降。那么长周期结构性的变化对短周期的经济和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对政策制定者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又有哪些启示？

首先，如何判断趋势变化的拐点在哪里？有一些迹象显示拐点可能就在眼前，包括经济增长放缓、贸易顺差持续下降、外汇占款过去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几个月连降等。但这些迹象是否意味着拐点已至，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上述诸多变化均受到一定的短周期因素影响，增长放缓和贸易顺差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球经济疲弱，而资金流出和近期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偏好降低有关。

其次，货币增长的长周期特征，不妨碍短期内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操作。过去长期总体宽松货币环境中也有短期的逆周期紧缩。我们认为 2012 年就处在这个紧缩的长周期与放松的短周期相叠加的阶段。2012 年的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将导致总量有所放松。

但长周期的紧缩可能限制短周期的放松程度，使政策易紧难松。未来外汇占款增速放缓将导致存准趋势性下调，公开市场操作的主题也将从回收流动性改为释放流动性。因此，央行主动收紧的调控更容易实现，回收流动性的效率提高。

另外，长周期的紧缩幅度与节奏，也受到外部货币环境的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尤其重要。如果美国经济复苏强劲导致货币政策转向，或欧债危机大幅恶化，全球风险偏好降低，则可能加剧资本外流，加速长周期拐点的到来。

最后，货币金融的长周期演变对政策制定者的最大含义是，要避免资产泡沫失控，加强维护金融稳定的机制和措施。从世界经验来看，几次大的货币金融周期都是以资产泡沫破灭，甚至金融危机的形式完成转折。

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就一定要在上半场控制好资产泡沫，要把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理解。从宏观审慎的意义上说，控制投资性需求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性调控(如限购、限贷)有助于让拐点时间较长，转折平稳些。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近几年快速增长的影子银行业务，不仅干扰货币政策的执行，也包含金融稳定的风险。需要通过审慎监管使其透明化和规范化，在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时，控制相关的金融风险。

作者：彭文生

来源：上海证券报（2012-3-1）

监管高层：贷存比不宜也不能废止

对于业界热议的商业银行贷存比改革乃至废止的问题，有监管高层日前对财新记者表示，贷存比不宜也不能废止。

“何为守住风险底线？这个底线应该就是流动性风险，作为流动性管理重要而有效的工具，贷存比恐怕不宜也不能废止，即使是汇丰银行，也在用这个指标来进行流动性管理”。上述监管人士称。

有银行高管透露，目前股份制银行正在拼命说服银监会，希望放松或废除贷存比规定，但他认为不宜放弃贷存比，或放松政策。因为过去的经济增长都是建立在高度的资源和环境消耗前提下的，一旦失去约束，恐怕会有失控迹象。

1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创新 2008 年以来的新低，令各界对信贷投放前景颇为关注，也使贷存比的争议波澜再起。央行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7381 亿元，同比少增 2882 亿元。

事实上，去年四季度以来，虽然央行提出要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但已有不少银行因受制于贷存比，投放乏力。各界也开始意识到，在双线调控机制下，仅仅放松货币政策，有时候恐怕无济于事。

数据显示，去年三季度，几家大行已经逼近或超过监管目标值，而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中贷存比超标的更是比比皆是。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货币当局释放出预调微调的信号，但不少商业银行的投放仍是有心无力。2011 年的年度投放数据显示，四大行的信贷投放更是较年初的目标下限收官，个别银行甚至未能用足信贷规模。

目前商业银行实施的贷存比要求来自 1995 年《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不可能轻易废止。如果要修改，需要通过相关的法律程序。监管人士认为，实践表明，在过去十几年间，贷存比的制度是符合实际，而且也是流动性管理简单而高效的工具。

事实上，流动性风险管理在去年已经凸显。某大行风险管理部人士透露，个别大型银行的经营现金流出出现负数，从拆出大行变成拆入大行，流动性风险压力十分巨大。由于理财产品的投资用款无法在时点考核时及时回笼，去年银行间系统几次延迟闭市，以满足某大行的资金拆借要求。财新记者此前获悉，今年 2 月份，某大行也一度因为理财产品划款而使当期存款锐减 6000 亿元，银行间市场再次为其延迟闭市。

作者：温秀

来源：财新网（2012-2-28）

周小川：理论上调整存准率的空间非常大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周一称，从理论上讲，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但是否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具体还要取决于国际收支平衡等因素。

中国央行高级官员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政府将加大对欧洲投资的承诺。他们称，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欧元区的投资组合做到了保值增值，并表示，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预期已经形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会越来越市场化。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是表明货币政策是松或者是紧。

周小川补充说，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主要流向房地产行业。

周小川还表示，在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时，要特别关注对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仍对欧洲抱有信心，中国将来也会一直是欧洲和欧洲市场的投资者。

易纲称，欧债危机最近的情况稍微有些缓解，但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易纲表示，中国在欧元区的投资组合，做到了保值增值，这样一个分散化的配置原则是有效的。

易纲称，中国将继续坚持多元化的配置，继续投资于欧洲的市场。他补充说，中国要始终把风险防范放在工作的首位。

谈到人民币问题时，易纲表示，中国近年来在减顺差、促平衡、扩内需、调结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人民币估值是否合理要由市场供求来决定。

易纲称，去年末以来，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持续的对人民币汇率的双向预期和双向波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会越来越市场化。

周小川也表示，市场供求关系对于汇率的形成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补充说，看待贸易顺差还是逆差，也就是贸易平衡状况，还是需要看长一点的时间段。

此外，中国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在同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一定会继续向前。

不过胡晓炼指出，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也要考虑一些条件；需要相应的配套的制度性安排，要考虑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

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总体来讲还是正的，只有在物价上涨比较快的情况下，才形成一段时间的负利率。他补充说，利率上调太快的话，会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

作者：Aaron Back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2-3-12）

日本转投货币宽松阵营

稳健货币政策阵营的最后一名“武士”也缴械投降了吗？看上去确实如此。日本央行(BoJ)决定引入一个通胀目标，并把债券购买计划的规模扩大一倍。至此，世界各国都已转投宽松货币政策阵营。这件事很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令人意外的是日本央行宣布这一举措的时机。今年 1 月底，当时在伦敦的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还在重申日本央行经常说的那句话——日本的通缩是结构性的，没得治。几周之后，他就转投积极货币政策阵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180 度的大转弯？原因很可能是政治现实。日本央行的特立独行已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

2008 年的雷曼(Lehman)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Fed)和英国央行(BoE)开始大举实施定量宽松政策，这涉及到购买大量政府债券。对许多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其本币与美元挂钩，因此它们在事实上输入了美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2011 年，稳健货币政策的两大传统堡垒——欧洲央行(ECB)和瑞士央行(SNB)——倒戈，转投通货再膨胀阵营。这两者的倒戈决定，都是出于政治实用主义的考虑，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瑞士当时的问题是，瑞士法郎的坚挺严重抑制了该国的经济活动。欧洲央行当时则迫切需要支撑银行业体系在欧元区外围国家问题债务上的敞口。

上述这些事情反映出一个更大的麻烦，那就是高负债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并存的世界所特有的压力。

在发达世界，社会和政治风险的平衡正推动政策尽一切可能朝通货再膨胀的方向发展。在新兴世界，自身政治地位往往脆弱的政策制定者们也一直跟随这个趋势，为的是保护出口部门的就业。

白川方明本月早些时候接受国会质询时饱受折磨。日本企业界强烈抗议日元飙升。索尼(Sony)、夏普(Sharp)和松下(Panasonic)等大名鼎鼎的日本公司都出现巨额亏损，而韩国三星(Samsung)的利润却创下历史新高。日元兑韩元汇率自 2007 年以来翻了一番，这虽不是唯一的致因，但它确实没起什么好作用。

以一些最客观的指标衡量，日本央行有充足的理由追加宽松力度。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 Deflator)过去 12 年里每年下降 1%至 2%，但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如今却小于 2006 年。

与欧洲央行不断激增的资产负债规模相比，日本央行追加的 10 万亿日元资产购买只不过是“麻雀的眼泪”。要想产生实质性影响，它还需要采取更多举措。最终它会这么做的，不论它是否愿意。从政治的角度看，它已经把自己牵扯进来了。

首先受到影响的将是金融市场。如果一家央行不断购买本来会被私人部门投资者购买的资产，那这些投资者就不得不为他们的资金另寻投资对象。过去几年的经验是，人为减少无风险资产的供给，会提振对风险资产的需求。

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则更难估计。尽管英国央行吸纳了 25%的英国国债，但它却未能把通胀预期提升到危机前水平的上方。在一个去杠杆化的世界，股价升高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

日本及整个世界提升通胀预期的一种方法是，推动股价强劲上升，升到使投资者开始把一部分资金投向房地产和大宗商品这类硬资产的程度。通胀的本质是“实物”价格的上涨。

正如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通胀高峰过去很久之后通胀才最终被制服一样，在债务危机和通缩被消除之前，可能也需要经历几轮循环。

在当时，正是通胀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从驯服通胀的斗争中获益最大。而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通胀就已处于低位的日本，最终却陷入了通缩。

如果这一次世界遵循同样的模式，那么通缩问题严重的国家将获益最大，而高增长的国家可能最

终会陷入严重通胀。

下面这个观点看似十分荒谬：与新兴世界中的明星国家相比，备受债务困扰的日本和欧洲核心国家的经济，可能是更好的投资对象。但是，它会比 1974 年时的那个观点——未来数十年表现最好的股市将属于备受通胀困扰、因罢工而陷入瘫痪的英国——更荒谬么？

作者：彼得·塔斯克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12-2-27）

阿里巴巴 22 位中高层大轮岗



上周末，阿里集团宣布了一项管理层轮岗计划，22 名中高层管理干部涉及其中，调动跨越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全部子公司。

有淘宝内部人士甚至说，“有的项目，甚至宁愿找外部合作，同是淘宝系的内部团队都很强势，各有压力，协作起来有时反而累”。

中国电商业最大的“帝国”内部正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调防”。

上周末，阿里集团宣布了一项管理层轮岗计划，22 名中高层管理干部涉及其中，调动跨越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全部子公司。

内部大轮岗

多数调动大致仍算对口。如集团资深副总裁张蔚由集团战略投资部调往集团战略参谋部、淘宝信息安全部资深总监倪良调往集团网络安全部、淘宝商家事业部资深总监王文彬调往天猫商家服务部等。

这项大动作被解释为加强集团各业务协同、组织打通及人才流动。阿里集团说，管理人员轮岗机制将成为常态的人才培养方法，成为集团组织文化建设的重点。

高管轮岗制度几年前在阿里集团内部已建立，阿里还成立了组织部，着眼于干部制度的建立，目前组织部所属干部已达 200 人左右。

此前，全球范围内企业推行管理层轮岗已有前例，IBM、摩托罗拉，以及国内的华为等，都已经建立了上述制度。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项计划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内部宣布“修身养性”策略完毕、农历春节前后就已制定，调动的管理层人员在人事方面本来就隶属集团组织部，而并不归属子公司。执行动作也可谓隐秘，22 人名单中的一位人士说，他是在上周五当天才接到通知，本周他将往返新旧岗位完成交接，下周起正式接手新岗位。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内部邮件公布的 22 人还只是涉及 M5 级别以上的调整名单。此外，自去年 12 月起至今，M5 以下的大量人员调动已经开始，“规模要比中高层人数多得多。”如淘宝不少商品类目负责人(M3 级别)换岗变更了负责的类目。

尽管如此，这项调整或许并不会对阿里各业务带来明显影响。数位业内人士说，淘宝等业务已足够体系化，即便部分岗位换人也会运转不误。

强化内部协同

有人猜测，这是否与大淘宝系反腐风暴有关。上周，阿里集团宣布内部调查显示，聚划算内部管理疏漏，存在违规操作，原团购平台聚划算总经理免职，同时还宣布开除 3 名违规员工。

“反腐并不是因，而是果。”熟悉阿里集团人士评价说，这次大调整的背后是马云在强化最高管理层对全集团的掌控能力，以强力推进大阿里人员、资源整合的“One Company 计划”。

一位前淘宝人士也认为，大换岗背后是阿里集团消解内部资源整合难度的愿望。目前集团旗下各业务子公司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使得协作难度逐日提升，有淘宝内部人士甚至说，“有的项目，甚至宁愿找外部合作，同是淘宝系的内部团队都很强势，各有压力，协作起来有时反而累。”

马云此前也曾有所感慨。去年天猫“十月围城”事件中，从美国急回的马云曾在阿里内部表达“伤心”，他说感觉阿里价值观有弱化，风波中大淘宝内部同心协力的程度不如以前。

前述人士说，一些高管在某些位置上已任职多年，公司内部也难免形成了一些小圈子，马云如今正是要打破这些藩篱，使得全集团都认识到整体一盘棋的格局。

与宣布换岗同步，阿里集团称 2012 年集团将只净增 200 名员工，这与马云 1 月内部讲话内容吻合。

200 人限招数字远远低于该集团往年的招聘规模。2009 年，阿里集团招聘员工 5000 多人，为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2010 年和 2011 年，集团的招聘也维持在上千人规模。目前，阿里集团员工已扩张到超过 2.5 万人。

阿里集团称，今天阿里巴巴的局面，提升发展内部员工的潜力远比招更多的外部新人重要得多。“我们应该也必须对我们的人才成长负责，对每个岗位负责”。

此前，阿里集团已悄悄清退了大多数实习生，原因之一被解读为减少不确定的管控风险，强化内部价值观的纯粹性。

眼下，阿里集团正将 B2B 业务私有化，并积极谈判谋求从雅虎手中收回控股权。阿里集团未来之路或将通向整体上市，而在此间强化协同整合、完备内部管理和外部业务拓展，显然是马云的大阿里棋局行至中盘的关键一步。

【观点一】

已成为企业培养人才的有效策略

有利于员工职业转型及职业生涯的飞跃式发展

阿里巴巴的人力资源及行政部资深副总裁邓康明非常敬佩马云的是，阿里对培养人才不遗余力，比别的公司做得更大胆，更愿意为培养人支付轮岗所带来的巨大成本。阿里巴巴一直认为：轮岗能为高潜质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挥创造力的舞台，协助员工完成职业转型及职业生涯的飞跃式发展，同时也对现有人才产生极大的激励，让组织充满活力，留住企业关键、核心人才。

目前，很多企业的战略目标很清晰，执行力却非常弱，有些管理者更愿意从绩效管理角度分析原因，认为考核指标不清晰、考核周期太长或者主管考核不力等，往往从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挖掘人的潜力上下功夫，却没有发现：部门之间协作的乏力，往往是阻碍人们往共同目标前进的阻力。而部门协作的不力，往往是因为人的思维方式、思考角度出了问题。邓康明认为：通过岗位的互换，消除岗位之间的壁垒，人们才学会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去思考、分析问题，才能真正地培养出系统思维的能力。

更利于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

企业高级管理干部应当具备对业务工作全面把握和对全局性问题分析判断的综合能力和丰富经验，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睿智、更实干。而要培养这种干部，显然只在集团公司的某一部门或企业作自下而上的纵向晋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使管理干部在不同部门间横向交流，在集团各种管理岗位的实践中锻炼提高，才能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完善能力结构，丰富管理经验，同时与各业务部门和投资板块的同事有更广泛的了解交往。

在集团公司系统内推行管理层轮岗，一方面有利于集团培养、考察和选拔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也有利于集团内部增进理解、促进协作，发现弊端、防止腐败；另一方面可以为员工个人成长创造更多的锻炼机会，丰富管理经验，开发多种能力，且有助于避免僵化、促进创新，消除官僚、活跃思想。

员工与企业的双赢

从企业层面讲：轮岗可以有效储备人才，从而提升组织的安全性、稳定性、动态适应能力以及组织跨部门协作的效率与效益。另外，在培养企业接班人方面，轮岗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跨部门的轮岗一方面可以使管理者和员工亲身体验其他部门工作的艰辛与内涵，从而能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思考与处理问题，形成换位思考；另一方面可以融通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人情，人情在，相互之间的沟通就会顺畅得多。

员工层面：轮岗不仅对企业有着多方面的价值与贡献，也同样非常受员工的支持与欢迎。轮岗可以重新点燃员工的工作兴趣并有利于员工自我职业生涯规划的确立与调整。创造职业宽度，满足员工成长的核心需求。学习与成长是员工职业生涯中最为核心的需求之一，轮岗可以使员工开拓视野、积累人脉资源、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与能力所在、锻造多方面的能力与经验，从而拓宽员工职业宽度，提高升迁的可能性。

【观点二】

轮岗制"良药苦口", 还需"对症下药"

一种彻头彻尾的人才管理倒退

一般来说, 实施轮岗的组织不外两个目的: 一是为组织培养人才, 二是防止滋生管理腐败, 除此无他。可是, 很多组织实施轮岗的事实却证明, 轮岗不只不能培养人才, 反而还成为很多组织逼岗、打击异己及残害组织的一种手段——不听话的人就再有能耐也要借机把你调去没油水的部门或地区, 让你自生自灭, 类似案例上网一搜多了去了。再从“防止腐败”的角度来说, 监督腐败靠的是体制, 查处靠的是系统流程, 在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一个想腐败的人,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腐败, 轮岗只能激发逆反心理, 从而使其更腐败。

在中国企业中, 大部分的体制流程都不完善, 几乎也没有优秀文化的沉淀, 所以, 每换一次领导, 就等于要换一次制度和办法, 所有的员工也都需要重新去适应, 这个过程最低需要三个月, 稍微有点管理常识的人进来算算账, 看看这三个月对组织效率的影响有多大? 这还不包括因为更换领导而导致的人心涣散和勾心斗角的成本浪费。中国企业效率低下是尽人皆知, 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频繁更换领导造成的。轮岗已经演变为一种人治下的管理悲剧, 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管理倒退。

用错了对象, 也许会变成毒药

能否让轮岗发挥作用、达成预期目的, 关键还在于轮岗人员的选拔。在这里要防止彼得原理现象产生, 即不要把技术人才强行往管理人才方向培养。轮岗对象的选拔一定要尊重管理者个人意愿。一定是双向选择, 即企业愿意培养他, 而他又愿意向全面发展努力, 不能上层单方指定。我们知道要做好工作, 能力固然重要, 但一个人的意志意愿似乎更重要。一个人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兴趣, 是注定做不好, 或达不到理想状态的。

因此, 企业安排轮岗之前, 一定要先做好竞聘工作, 先让企业愿意全面发展的管理者报名参赛, 再从中选拔企业也愿意培养的人才。这样轮岗的效果一定会超出企业的预期。轮岗制是企业高阶人才培养的良药, 但是火候掌握不好, 药效会打折扣, 用错了对象, 也许会变成毒药。

是从人力成本到人力资本的浪费

对于中小型企业(专业化程度高和产品特性强)就不一定适用, 主要是从组织建构到部门职能划分, 再到职位设置, 基本上职位与岗位对应的。换言之, 也就是一职一岗, 而且都是按“工作说明书”的资格和条件“对号入座”的。因此, 要是实行轮岗制度, 显然是不合适, 不但是其经验和专业上的限制, 而且更会形成管理上的混乱; 更是从人力成本到人力资本的浪费。

笔者认为, 在集团公司系统内实行管理高层的岗位轮换, 是必须而且要实行制度化和机制上的保障, 也就是着眼于长远。然而, 对于中小型企业充其量也只能是从高层管理职位上考虑; 对于中层管理岗位来说, 着重在培养成为既具备企业经营思维、又具备参与市场竞争意识和经验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特别是企业的晋升的机制, 有效地留住管理人才和解决企业发展壮大的问题。只有当企业发展规模形成实际上的集团化或者事业部建制时, 才能够逐步地从上而下地推行轮岗制。

【观点三】

处方：制度设计完善+量身匹配执行

企业轮岗 需有备而行

实际上，放眼国内外企业，随着企业的发展进程的不同，轮岗方式开始变得更为多样化。在日资的大中型企业中轮岗早已盛行，从副课长开始的管理职务就要实行轮岗。随着级别的升高，轮岗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目的旨在打造复合型人才。通常情况下，一次轮岗的周期是三年，但如果干得不好，一年就回到原来的岗位上。而一些欧美企业则认为轮岗可以强化人的沟通能力、人脉关系、扩展视野、培养战略眼光，为其升职做好准备，故有明文规定，经理人要有至少三次的轮岗经历，才有资格担任总裁。

轮岗培训是企业达到高速运转的一种人才培养的有益方式，在销售型企业多见，通常能培养员工工作乐趣、挖掘其潜能、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岗位替代性、补充知识与经验、增进上下游和周边职能运作的了解、减少部门间因缺乏理解而造成的内耗、增强员工综合技能、实现团队之间的磨合与互补等。轮岗不仅可以使经理人亲身体验其他部门的工作，站在更高更广阔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并且形成换位思考理念，最终成为战略性人才，从而培养各部门的协作精神

量身定做 配套执行

很多岗位轮换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详尽的计划作指导，或在整个岗位轮换的计划中忽略了员工的发展。如果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可以建立一套有竞争意识的岗位轮换制度（把岗位轮换作为激励和晋升的一种手段），要求所有希望进行岗位轮换的员工必须提交正式申请，会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变现自己。

我们认为岗位轮换的成功需要具备以下因素：它有具体的、可量化的标准和考评系统；它要同其他人力政策共用发挥作用；它要根据公司自身的要求和业务的需求来“量身定做”；它更关注员工的核心竞争力；管理人员和考评人员经过认真的培训；指定明确的目标和发展方向；它和奖励机制挂钩；避免在公司薄弱的部门间进行岗位轮换等。

对正在或将要进行岗位轮换制度的企业，我们应该提示的是，企业要把岗位轮换作为公司培训与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执行，并要清楚地认识到在岗位轮换需要发展和培养员工何种技能。岗位轮换制度不仅可以用于专业和管理岗位，还可以用于其他多种工作岗位；不仅仅适用于老员工，还适用于新员工。

来源：<http://news.chinaceot.com/zt/views31/>